



#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2月15日第3期

总第149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 《记忆》149期

### 目 录

#### 【专 稿】

白 磊 剥洋葱现象——1966年陕西省文革运动的初起及背景

范世涛 关于《女附中十七年大事记》章彬杰抄本的说明

#### 【评 论】

不 平 林彪的四大经典马屁评析（一）

#### 【口 述】

李春光口述/文靖撰写 回忆周总理“五九接见”

#### 【大饥荒】

陆 凌 一九六零年(四)——谁之过？

#### 【述 往】

王复强 一个知青上山下乡的艰难历程（一）

王丕忠 镇反纪实：我的劳改三十年（五）——苏北农场（上）

#### 【资 料】

1.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7年11月2日)
2.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7年12月7日)
3.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1月5日）
4.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1月26日）

#### 【作者补遗】

《广东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的升沉轨迹》一文补遗

#### 【本刊声明】

## 【专稿】



白磊，1974年出生于陕西西安，当代国史研究者。曾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转业后，在《各界导报》《今早报》等媒体任编辑、记者、摄影记者，主要研究方向：陕西党史及陕西文革史，一九六零年代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陕西省委的干部派别与矛盾分歧；文革中的陕西省委；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组织结构与干部组成；西安红卫兵组织派别的兴衰与分歧；批林整风运动中的陕西驻军等。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访问学者。先后在《二十一世纪》、《炎黄春秋》、《陕西文史资料》、《记忆》、《昨天》、《往事》、《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观察》等刊物与网站发表学术论文及随笔多篇，并被共识网、明镜历史网等多家网站转载。

## 剥洋葱现象

### ——1966年陕西省文革运动的初起及背景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讲座讲稿）

白磊

1966年爆发的文革运动绝非并非一朝一夕所导致，每一个历史事件的背后，都有着极其复杂的各种因素，如历史环境、干部体系和路线矛盾，陕西省文革运动也如此。主讲者利用手中与之有关的历史资料和对当事人的访问，试图透过历史事件的表面现象，深入分析陕西文革运动产生的前因，以及重现历史的部分细节，从讲述中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

## 四清运动：西北局与陕西省省矛盾分化的开始

1964年2月9日及29日，毛泽东在两次会见外国党领导人的谈话中，先后批评中共党内有人不讲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并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谈话，反映出他认为中国已经出了或正在出修正主义的完全不切实际的严重估计，明白无误地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中央一线多数领导人。为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全国的全面阶级斗争”埋下伏笔。而当时的陕西省，除了全国性的“左”的路线和现象一一具备之外，还多了两顶大帽子，即“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流毒很深”，“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不彻底”。文革后曾经一度主持陕西工作的王任重认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陕西省“左”的程度和恶果，是超过全国其他省份的。1964年，陕西全省逮捕6470人，拘留5000余人，平均每天逮捕30余人。受到开除公职处分的干部和教师1450余人，是1963年的3.3倍，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党员3200余人，是陕西省1949年以来开除党员党籍最多的一年，而这一数字也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各省。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左”的思想意识有着极大的关系。举例来说，在刘澜涛亲自坐镇指挥的陕西省长安县社教工作点，西北局抽调中央局、省委、市委三级干部16400余名，发动群众清查漏划地主、富农，深挖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进行所谓“民主革命补课”和夺权斗争运动。在随后开展的“四清运动”中，号召基层干部坦白、检举、揭发，通过清理账目、财务、粮食及进行外调，清查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及其他违法乱纪行为，对所谓的“四不清”干部，则发动群众反复批判、斗争，责令退赔，根据坦白和退赔情况，定性处理。并在此基础之上，整顿领导班子，长安县社教工作团还独创了“围攻根子”的作法，即把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放在群众中去揭发和批斗，揭发不出问题又经得起批斗考验的，才能成为可以依靠的“根子”。1964年第四季度，长安县区级干部受处分的人数比例占当时干部总数的45%，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



被撤换的则占到 76.2%，长安、延安、西乡三个社教试点县共清查出现应退赔现金 813 万元，平均每个农村基层干部应退赔 183 元，比陕西省当年人均国民收入 122 元还多出 61 元。三个社教试点县在批判斗争中共发生自杀事件 430 起，死亡 364 人。<sup>1</sup>

在思想文化界，中共陕西省委成立了以省委书记处书记舒同为首的“思想战线指挥部”，下设“清理反党党史小组”、“文艺批判小组”和以“批修”为内容的理论学习班，清查所有关于中共党史和陕西党史的小说、散文、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和相关文艺作品，批判本地“毒草”作品和其作者，如长诗《刘志丹》、电影《桃花扇》、戏剧《游西湖》、《赵氏孤儿》、《卧虎镇》、《破宁国》以及反党画、反党歌曲等。全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戏曲剧院院长马健翎在批判中自杀身亡，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主席柯仲平在受到清查时猝死。“长安画派”著名画家石鲁被整肃得精神失常。与此同时，党政机关内部的政治空气也愈发紧张，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党政干部的十条规定，要求党政干部清查阶级成分和阶级立场，清理住在党政机关宿舍的干部家属中的地、富、反、坏分子，将他们遣返回原籍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陕西省委左的领导人（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林）在 1964 年冬季对所有省委机关干部进行清查排队，清查排队的结果为，省级各部、委、厅、局和各地委、行署、县委县政府，领导干部班子烂了和有严重问题的占干部总数的 46%，后来再次清查排队时，比例则上升到 60%以上。<sup>2</sup>

### 刘胡斗争：“剥洋葱现象”发端

1964 年 11 月，鉴于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病重，中央委任胡耀邦代理陕西省委书记一职，并兼任西北局第二书记。而在此之前，关于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人选，刘澜涛也相继与中央部分领导人讨论过多次，6 月 18 日，刘澜涛在北京友谊医院探望养病的张德

<sup>1</sup> 林牧著，《烛尽梦犹虚：胡耀邦助手林牧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8 年。

<sup>2</sup> 林牧著，《烛尽梦犹虚：胡耀邦助手林牧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8 年。

生时，谈到了西北局决定指派西北局候补书记王林直接帮助陕西省委工作。<sup>1</sup>关于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人选，刘澜涛在写给邓小平的信中透露出他对省委现有领导的看法。此信内容如下：

小平同志：

张德生同志因癌症不能再继续为党工作，实在可惜。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同志因心脏病暂不能工作，即使能工作也不能负重，而且也只能担任第二书记职务。近年来因没有坚强的核心领导，对工作已产生不利影响。所以请中央能派一位省委第一书记到陕西工作，先任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当前工作任务繁重，恳请早日决定，至盼！

此致

敬礼

刘澜涛

1964年8月31日<sup>2</sup>

这封信中明确表示了他对赵守一的不信任和不放心，甚至是对陕西省委大多数领导干部的排斥和敌意。此后的12月1日，胡耀邦去西北局报到。刘澜涛即对他说：“你不要住在省委，搬到西北局来。我们是革命派，他们是××××派。”（四个×见之于耀邦的原始记录，文革中被揭发出来，但揭发人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胡耀邦说：“我的主要工作在省委，还是住在省委好，便于工作。”胡耀邦是要多听听省委其他同志的高见，以便尽快了解陕西的一些情况。刘澜涛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让他找王林谈谈，而王林则向胡耀邦介绍陕西的阶级斗争如何严重，“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流毒如何深广，干部队伍如何不纯，并且指名道姓，认为“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和常务副省长刘邦显是陕西右倾

<sup>1</sup> 力平编，《刘澜涛生平记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

<sup>2</sup> 同上。

势力的代表人物”。<sup>1</sup>而这条史料在刘澜涛的日记中也得到了旁证，1964年12月5日刘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到，“下午，约见新任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主要谈小平同志讲话：西北地区封建地方主义严重，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训练干部。”<sup>2</sup>

胡耀邦初到陕西，弄不清陕西的水有多深。他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讨论“陕西省的农业生产为什么上不去”的问题。在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和听取有关方面的汇报后，胡耀邦认为陕西省在“大跃进”中的“虚夸风”、“共产风”不像其他地方那样严重，生产受到的破坏比较小，但是，农田基本建设也上得不快；在三年调整时期，工业下马过头，特别是基础工业和为农业服务的工业下马过头；以致经济恢复的物质基础，不如先进省份。至于主观上的原因，耀邦指出：“领导生产因循保守，小手小脚。”指出：“陕西有一股保守势力，压制一切新鲜事物。”指出：“公购粮负担过重，陕西人老实，不会向中央叫喊。”谈到社教运动，耀邦未作全面估价，先提出几个具体问题，就是：“捕人多了一些；‘双开’（既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多了一些；面上夺权斗争打击面宽了一些。”。在这次讨论中，由耀邦提议，陕西省委和省政府作出以下几项决定：1、捕人暂停；2、“双开”暂停，留待运动后期处理；3. 面上夺权暂停，待重新部署后再行动；4、省、地、县三级抽调干部到农村基层，参加生产、领导生产；5. 将1965年的粮食征购任务，由17亿斤减为14亿斤（对这个问题，胡耀邦亲自给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写报告。报告说：先退下来，让农民休养生息，缓过气来，今后会给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6、向国务院申请，在陕西建设第一批年产7.5万吨的五个小化肥厂；7、向国务院主管部门申请，1965年给陕西省增拨化肥3万吨。前四条，省上立即执行；后三条，很快就得到国务院的批准。

1965年春节期间，胡耀邦在陕西省委书记处会议上提出：现在干部思想不解放，缩手缩脚，顾虑重重，不敢认真执行《二十三条》。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把生产搞上去？我建

<sup>1</sup> 林牧著，《烛尽梦犹虚：胡耀邦助手林牧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8年。

<sup>2</sup> 力平编，《刘澜涛生平记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

议春节以后，除了常务书记留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以外，书记处其他同志都下去，分别到各地、县委参加多级干部会议，直接宣讲和落实《二十三条》。省委书记处赞同耀邦的建议，并按陕南、陕北和关中东部、西部分片负责，胡耀邦去陕南。

一九六五年春节刚放完假，胡耀邦即带着省委副秘书长白瑞生等人，2月5日到12日乘车下乡去陕南，采用日夜加班的办法，在8天中走了安康地区10县中的7个县。他同县、社两级干部开座谈会，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征求意见，一个一个排队，一件一件事处理。对于一些明显抓错了的人和处理错的案子，胡耀邦说：“咱们开一个省、地、县、社四级书记会议，四级都认为搞错了的，立即纠正，立刻放人。这样做似乎不大符合组织程序和法律程序。可是，那些案件原先都没有经过什么组织程序和法律程序，而且大多没有定案，采取断然手段纠正那些未经合法程序处理的冤案、错案，有什么不可以呢？”耀邦走过陕南7个县以后，不仅对社教运动的“左”倾认识更为深刻，而且对生产之凋蔽，经济之萧条，民生之困苦，更有了直接的感受。2月12日，他在安康地区干部大会上发表了系统的讲话。2月14日，他又在安康地委亲笔起草了《电话通讯》。安康讲话和《电话通讯》指示：社教以来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停职和撤销工作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段考验后再作结论；过去犯有某些错误已经交代过的干部，不再“洗手洗澡”，只要搞好工作搞好生产，一律既往不咎；从今以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多高，一律从严处理。胡耀邦提出的解放干部的“四个一律”，受到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极大欢迎，人们搞好工作和生产的劲头很大。

然而胡耀邦不知道的是，恰恰就是他的这些纠偏措施和举动，刺痛了刘澜涛为首的西北局某些领导人，2月17日，刘澜涛打电话给彭真，“就胡耀邦同志的电话通知内容交换意见，认为干部四条处理办法不妥当，会引起混乱，翻案风，不经省委集体讨论不妥。彭真同志指出为何不请示西北局？同胡耀邦（在汉中）通电话，了解他近日工作情况，并告诉他电话通讯内有不妥的地方，会引起下边产生混乱，同时，这样重要的问题应该经过省委集体讨论。胡表示：不会吧，可以注意。”（《刘澜涛生平记事》第202页）2月27日，



“下午接彭真（北京）电话，彭真同志通知：中央、主席对胡耀邦同志《电话通讯》中一些问题的批评。同意西北局的意见，并由西北局讨论。晚，接胡耀邦同志信，阅后复一信。1月13日胡耀邦起草《电话通讯》下发陕西各地执行。西北局上报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把西北局来电送给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彭真看后，觉得那个四条不够确切，需要打个招呼。第二天，彭真到毛泽东那里谈工作时说了这件事，毛泽东说：告诉耀邦注意一下。刘少奇看了《电话通讯》全文，说除了四条，从字面上看，阶级斗争也讲得少。胡耀邦就是搞阶级斗争的嘛，怎么会忽视阶级斗争呢？（《生平记事》第202页）。3月8日的刘澜涛日记里，又出现了关于胡耀邦和《电话通讯》的字句，“……下午，和胡耀邦谈话，肯定胡耀邦到陕西，成绩有五：把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举得很高，是抓革命的，促生产的，干劲很大，能联系群众。缺点有四：（1）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上对社教成绩肯定不够，对缺点讲得很多很具体；（2）《电话通讯》中的“干部四条”很不妥当，会使许多人翻案，主要是这个错误；（3）那样提倡集市贸易，说集市贸易有几条好处，不妥当；（4）同大家商量不够，没有很好地实行集体领导。”可以清楚的看出，刘澜涛眼中的所谓的胡耀邦成绩不过是泛泛而谈，是面上的东西。而最主要的就是胡的错误，每一条都很具体，认为胡耀邦的《电话通讯》冲击了刘澜涛所主持的长安社教，“干部四条”是“右倾错误的”，集市贸易更是与西北局的政策不符，而最后一条，则指的是胡对王林、舒同等刘澜涛在陕西省委的亲信不商量不尊重，实际就是对刘澜涛的不尊重。在之后召开的西北局书记处会议和陕西省委常委会议中，刘澜涛力主批胡，并指示将胡耀邦的检讨报送中共中央，并加发陕西各市委、地委、县委，这样就把批胡在全省公开化了。陕西省委领导干部当时也支持刘澜涛，或者赞同胡耀邦的观点来划线站队，凡是支持刘澜涛的领导干部很快受到西北局的赏识和提拔，如王林，凡是赞同胡耀邦观点，或在运动中批胡不彻底不主动者，即被视为政治异类，属不可靠的干部被批判，如赵守一。

## 1966：风雨欲来前的政治整肃

陕西所谓的黑线人物总根子，从“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到“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再到“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反党集团”，刘澜涛完成了他以极左的眼光审视陕西的黑线发展历史脉络，并按先后时间、不同事件和主要人物，完成了对这一假想敌的推断和证据落实，从而形成文革前陕西干部的主要罪名之一。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清理、分化，使刘澜涛为首的西北局对陕西干部的“剥洋葱”模式的逐渐展开。

胡耀邦多次被批判，但仍无法过关，以刘澜涛为首的西北局和以王林、舒同为首的陕西省委两派仍不放过胡，即使胡耀邦离开陕西之后，西北局与陕西省委还在对胡耀邦进行“缺席审判”，如1965年7月在兰州召开的西北局工作会议，以及同年8月陕西省委召开的第127、128次常委（扩大）会议，都对已经离开陕西的胡耀邦进行揭发和批判，以切实“丢掉胡耀邦那一套”，甚至中央任命霍士廉接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时，已升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的王林让陕西省委办公厅送去省委128次常委（扩大）会议的全套文件和记录。霍士廉看了文件和记录，不以为然。他对秘书说：“这纯粹是谩骂嘛！谩骂不是战斗。”文革发动前的1966年5月，西北局还在西安举办“陕西省文教系统文化大革命学习班”，将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身边的工作人员与支持他们的干部集中在一起，相互批判揭发。

1966年4月底，中共西安市委根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指示要求，连续召开了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和讨论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和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并就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出具体安排，会议除要求各级领导和单位学习领会毛泽东的指示和《纪要》精神，成立专门负责文化革命的机构之外，还特别提出要积极参加批判邓拓、吴晗、翦伯赞、田汉等人的同时，摸清西安市文艺界、学校、报纸等方面的情况及田汉等人来西安活动的情况。5月18日，西安市委常委丛一平、薛焰召开会议，要求市委各部抓好认真学习文件，发动群众，组织文章批判“三家村”工作，

摸清一下各单位自己队伍的状况，特别是基层单位领导核心的状况，准备撤换那些“不宜担任文化革命领导工作的人”，并揭发本地区本单位有哪些“黑线”影响。<sup>1</sup>

5月26日，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听取了西安市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按照常理思维，文化革命首先要从文化方面着手，揪出文化教育界的所谓的“黑线”及“黑手”，是当前运动的重点问题。市委书记薛焰在汇报中指出“戏剧界黑线，从两方面来：一条从北京戏剧方面来，一条从赵伯平方面来。批判戏剧以现代戏为纲，强调挖掘、继承。赵伯平很强调挖掘继承。《卧虎镇》是赵伯平授意叫写的。”“西安市文化局局长杨公愚的思想受赵的影响很深。赵伯平给文教局四次谈话，有三十条，已印出来讨论。”“教育方面还没揭出一个系统的黑线，但主要是掌握在资产阶级、地富出身人的手中。市上共80多个中学，还有厂办、民办的中学。教育局局长是混进党内的分子（张越），副局长黄克，公开讲教育依靠老教师。”“西安市委，牵扯到文教部长方成、黄克。”并提出《西安晚报》的问题“是严重的”，“应按澜涛同志指示认真去搞，彻底改造，不能敷衍。”

赵伯平，陕西蓝田人，1928年加入中共，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同志，曾任陕北特委书记，抗战时期任陕西省常委、组织部长，1949年后历任西安市委书记、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是陕西老资格的领导干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赵因不肯批习仲勋而被划入另册，明升暗降到北京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可以说，赵伯平的问题是挂在习仲勋的线上，是呼之欲出的“死老虎”，所以西安市委首先将“黑线人物”自然地挂在赵伯平身上，这样既不影响和点名现任的省市领导干部，也符合了政治批判需要。

### 批判“西北三家村”到“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案”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通知》主要内容为两个部分，一是前言，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

<sup>1</sup> 《中国共产党西安市委员会志 1925.10-2002.7》 中共西安委办公厅编 2004年6月第一版。

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采取组织措施；二是列举《二月提纲》10条罪状，逐条批判，提出一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三是结语，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该通知下达后，陕西省委根据西北局指示，报经中央批准，于5月底任命省委书记处书记肖纯兼任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并确定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抽调300名干部组成32个工作组，分赴西安第十中学、西安晚报社、西安市中心医院等三个重点单位和一些学校开展工作。并指示“把斗争的火力集中在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一切牛鬼蛇神身上”，“把学校的领导权坚决夺回来”，但同时也提出“不准大字报上街，不准群众上街游行，要内外有别，要有良好秩序”等规定。与此同时，陕西省委报经西北局和中央批准，将原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以所谓“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反对民主革命补课”“把持各种文化阵地以进行反党活动”等诸多罪名，对其进行批判，成立专案组对赵审查，并作为反面教材以省委文件通报全省，要求“进一步揭发批判他的罪恶事实”、“肃清他的影响”；一九六六年六月和八月省委两次报经中央批准，撤销了赵守一省委第二书记职务和党内外一切职务，隔离审查，并在报纸上点名批判。<sup>1</sup>

赵守一与赵伯平一样，是关中地区干部，1936年加入中共，文革前曾任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陕西省委书记和第二书记等职务。赵伯平是因为不愿意批习仲勋而被刘澜涛划入另册，而赵守一则是因为在胡耀邦主政陕西期间支持胡耀邦而被刘澜涛视为不是同一条线的领导干部，是“陕西省委内右倾势力的代表”而不被重用。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霍士廉在陕西省委常委会议上提出，“以前澜涛同志说省委的问题是一两个人的问题，大多数人是好的，现在看赵守一是一个。虽然是少数人的事，但影响很大，必须搞深搞透。二是赵守一的问题一揭发，机关文化大革命一开展，党内牛鬼蛇神都要抓出来，但要把由于认识问题犯了错误的要区别对待。团结95%的人，包括这部分人。混

<sup>1</sup>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赵守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1979年11月15日。

入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混进来的反革命，蜕化变质分子，这几种人合起来有一批。”“赵守一案中需要处理的人迅速处理，不要拖泥带水。地委需要处理什么人，向省委报告，批准要斗争的，也要定。薛焰要批判，但有计划、有步骤的搞。”<sup>1</sup>

其实批判赵守一和之后被西北局、陕西省委抛出的陕西省长李启明只是刘澜涛“剥洋葱”模式的第一个步骤，据时任省委副秘书长的林牧后来回忆，打倒所谓的“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西北三家村”的斗争，在三种不同场合进行，即：正式会议、“集训班”和“隔离审查”。第一条战线是正式会议。从6月1日到7月10日，西北局在西安召开了40天第三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会议前期扩大到西北五省、区的省一级党、政领导干部；会议后期扩大到西北五省、区的县委书记。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揭发和批判以胡耀邦为首、以赵守一、李启明为副的“西北三家村”。这是西北局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杀气最重的大会。7月15日至8月5日，陕西省委接着召开扩大的省委委员会，继续揭批胡、赵、李“三家村”，并在会议结束前作出决定：撤销赵守一、李启明等人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在报纸、广播和群众大会上公开进行批判。导致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主任刘子义，在会议住地人民大厦房间内上吊自杀。第二条战线是集训班。从6月13日到9月18日，陕西省委举办“陕西省文化大革命座谈会”，后来改为“干部训练班”，因参与的人大多为内定的“黑帮分子”，所以也被称为“黑训班”。参加人员有西北局的副秘书长、处长，省委秘书长、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宣传部副部长、农工部副部长，部分地委书记和省委办公厅、宣传部的部分处长和干部，共40余人。9月21日，由西安秘密转移到陕西耀县一个山沟里，对外称“九二一部”，对内则不准称呼姓名，一律使用编号和化名，单独审讯相互批判。“黑训班”直到1966年12月中旬被西安部分大专院校红卫兵发现后才解散。这个训练班的任务是揪出和批斗“胡、赵、李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成员，成员多为支持胡耀邦和在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身边工作过的干部。第三条战线“隔离审查”，就是特设的秘密监狱，涉及胡耀邦一案

<sup>1</sup> 1966年陕西省委常委会议记录。自存记录本。

的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明在公开批判后被转到专门设立的监禁地点继续关押审查。

1966年的6月3日晚,陕西省委派出了以省委书记处书记严克伦为首的工作组进驻交大,领导西安交大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驻学校后,只是将交大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凌雨轩抛出来批斗了一下,其他校党委成员都没有动。这样就激起了学生们的极大不满,说工作组是丢车保帅,小骂大帮忙。6月5日,西安交大工程物理系810(41)班党员学生李世英模仿北大聂元梓,率先贴出了“坚决赶走工作组”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就像导火索,一下子点燃了交大学生们不满情绪的火药桶。6月6日,工物系810(41)班贴出了“省委工作组的十大罪状”的大字报,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省委工作组是冒牌的,一口咬定省委里有黑帮分子,省委工作组就是他们派到交大捂盖子,保护校党委中的黑帮的冒牌工作组。一时间,交大校园里又一次大乱,大批大字报贴在了行政教学楼前,与6月2日不同的是,大字报的矛头指向的是工作组和陕西省委。有学生围着工作组成员辩论;有学生上街到邮电大楼,给党中央、毛主席打电报写信,要求派人来交大处理问题。另有一批学生由交大学生会主席杨克剑,劳动生活部部长王永婷等带领到西北局,要求见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请他解决交大工作组的问题;还有几个学生组织赴京代表团直接找党中央反映交大工作组的问题。有些学生到其他院校串联,有些学生在街上拿着自制的喇叭筒,在街上宣传交大工作组压制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些学生下厂,下农村串联的。与此同时,陕西省委发出《给交大全体师生员工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西北局、陕西省委是革命的,要警惕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将“六六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五个带头闹事的学生成了反革命分子。其中有李世英和动力二系压缩十二班的女学生、学生会劳动部长王永婷,李世英等人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得不检讨,但绝不承认自己反党,被逼无奈之下,李世英服安眠药自杀,被发现后关进医院隔离监禁。工作组又将王永婷的私人日记和与恋人的通信公开示众,进行人身攻击,导致王永婷于7月9日跳楼身亡。王永婷自杀身亡的消息很快传遍全校,震惊了广大学生。工作组感觉事态无法控制,立即决定停止批判学生,



省常委会决定抛出西安交大校长彭康“自首变节”的档案材料，召开全校的批判叛徒彭康大会，以此转移学生对工作组的愤怒。7月18日，得知消息的毛泽东说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明确地支持了学生，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24日下令撤销工作组。当天下午，北京各高校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西安各高校师生也在西北体育场收听实况转播。刘澜涛在会上作了检讨。说：“工作组是我决定派的，工作组犯了错误，我应该负责。”

而与此同时，西北局觉得已抛出的赵守一、李启明是“死老虎”，不能满足当前运动的批判需求，而彭康虽然行政级别高（行政五级，比刘澜涛还高一级），但成为批判对象已成定局，西北局领导和陕西省委决定再抛出一批领导干部。7月22日省常委会上，霍士廉提出报上十五人的名单，点名批判，十五人中除了已经抛出的赵守一、李启明、彭康之外，还点了柯仲平、丁济沧、吴刚、李宗阳、胡采、丛一平、袁烙、马健翎、黄俊耀、郭绳武、霍松林、傅庚生、孙敬、郭琦、罗明、宋醒民、王云等一批文化教育系统领导干部的名，如陕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郭琦，《陕西日报》总编辑丁济沧、《西安晚报》总编辑袁烙、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刚等，供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批判。省委书记处书记舒同插话：“拟先批《桃花扇》带出孙敬，再搞《谢瑶环》，把戏曲剧院的一些人拉出来。先搞文艺界的人。”<sup>1</sup>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西北局和陕西省委也成为革命群众造反的对象，刘澜涛在推出种种干部仍不能保全自己的政治地位时，于1966年底终于被西北局机关的造反组织“红总”揪出游斗，从而一跃成为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的头号“走资派”、“三反分子”。1967年3月16日，中央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这一文件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

<sup>1</sup> 1966年陕西省委常委会议记录。自存记录本。

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澜涛成为名列薄一波之后的“大叛徒”，在陕西各造反派组织批斗的排序中，刘澜涛始终是第一位，而排在他之后被批斗的，则是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据资料显示，仅从1966年11月中旬到1968年1月的14个月中，对刘澜涛的各种批斗会达1000多次，平均每天3次以上，每次少则几十人，多则20多万人。“打倒大叛徒刘澜涛，解放大西北！”的口号，响遍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及新疆；刘澜涛两耳被震聋，体重由70多公斤下降到不足40公斤。夫人刘素菲于1968年12月31日不堪凌辱跳楼自杀身亡，刘澜涛的四个子女沦为“黑帮子弟”，被四处分散劳动改造。不知道刘澜涛在批斗时有没有想过被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整肃过的人的下场？据说文革后刘澜涛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时，在一次公众场合遇到了已是全国政协常委赵伯平，刘欲与赵握手，赵视而不见，刘澜涛尴尬的对赵解释说，当年整你，是毛主席指示的。赵冷笑反问刘：主席去世了你这么讲，主席活着的时候你敢这么讲吗？！刘澜涛哑口无言。

## 结 语

综上所述，从1964年的“四清运动”开始，在西北局的控制和指挥下，陕西省自始至终贯彻了一条“左”的政治路线，在刘澜涛等部分西北局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中，陕西有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即所谓的“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和“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反党集团”，陕西也被视为“反党老巢”，陕西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被视为“很不彻底”，绝大多数本土出身的干部被视为“不纯洁”“不可靠”，甚至是“有问题的”，刘澜涛等一些西北局领导在完成种种的无错推断后，得出了以上种种结论，并通过历次政治运动，整肃了那些不跟随他的政治路线，所谓“右倾势力”的领导干部，顺利的完成“剥洋葱”，在推出了各种人肉挡箭牌后以保护自己，完成这一系列动作后，万万没想到的是“六十一个叛

徒集团案”被中央重新提起，他也成为这个“叛徒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终于坠入文革运动的政治绞肉机之中。

君特·格拉斯特在反思德国历史的《剥洋葱》一书中说，“回忆可以作弊，可以美化，可以伪装”。文革历史是否也是如此呢？史料可以作弊，记忆可以美化，甚至是有的刻意伪装和曲解误读这一段历史。在当前官方不开放原始档案资料，当事人又有意或无意的回避历史的情况下，我研究地方文革历史，并非是因为对中共上层的政治纷争而好奇窥视，而是希望通过历史的文字碎片，及亲历者的讲述回忆，来揭开官方历史层层覆盖的谎言，提供主流历史有意无意忽略和回避的真相。而研究中国大陆的当代史，正如剥洋葱一般，在瓣瓣洋葱之间，掩藏着被遮蔽或忽略的悲剧，越往深处越能感受到光阴背面那种鲜为人知的惊心动魄。剥开历史的内核，呈现出来的辛辣和酸涩，令人唏嘘，泪流满面。我觉得当前对文革史的研究，虽然迟了，但还不晚！

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这个演讲活动，也希望各位老师和朋友能多多批评和指正。  
谢谢大家！ ■

2014年11月

香港中文大学雅礼宾馆

【专稿】

## 关于《女附中十七年大事记》章彬杰抄本的说明

范世涛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女附中）<sup>1</sup>是北京一所负有盛誉的重点中学，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女儿们<sup>2</sup>多曾在这里就读。近年来，这所学校的历史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对相关历史文献的需要也变得格外迫切。

2015年3月，我在北京旧书市场购得一份《师大女附中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初稿）》<sup>3</sup>抄本。现已公开发表在《记忆》第137期，供研究者参考。

《大事记》成稿于1967年6月。当时的社会氛围与现在大为不同。下面对这份抄本的来源、编写情况和独特的文献价值作简要说明。

### 一、关于抄本的来源

在北京的旧书市场上，经常可以买到无名的手抄本，大部分抄本已经无从考证抄写者的身份和抄写的详情。但《大事记》抄本可以确定出自原北京女四中<sup>4</sup>副校长章彬杰之手，可谓幸运。

判断这一抄本出自章彬杰之手的理由如下：第一，《大事记》抄本系章彬杰旧藏。旧书市场上，由于书商难以对经手的资料价值给出准确的估价，通常不愿意买书人一一挑选、分别定价，而更乐于采用整体打包出售的办法。我见到这份《大事记》抄本时，它混杂在一堆散乱的资料当中。因为书商不愿意零售，为了买下这份抄本，我不得不买下了整堆资

<sup>1</sup> 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前身。

<sup>2</sup> 如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刘平平、刘亭亭，邓小平的女儿邓楠、邓榕，林彪的女儿李晓霖、林豆豆。

<sup>3</sup> 本文标题“女附中十七年大事记”系“师大女附中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初稿）”简称。为了叙述方便，下文进一步简称它为“大事记”。

<sup>4</sup> 北京女四中1968年初改名朝阳中学，1991年再改为北京市陈经纶中学。

料。回家之后我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发现其实并不乱，而是自成系统，共同之处是全都与章彬杰的个人经历有关，如她的个人简历，照片，检讨，个人总结，女四中或朝阳中学的员工名录等等。可以确定，这些资料系章彬杰旧藏，《大事记》也不例外。第二，除了少数段落以外，《大事记》抄本字迹与章彬杰其它手稿（如个人总结）完全一致。而例外的少数段落，字体富有童稚气息，很可能是章彬杰家人临时客串。

章彬杰怎样得到《大事记》的底本已经无从得知。但根据现存的其他资料，可以判断她是为了适应女四中当时“复课闹革命”的需要，在1967年下半年抄写这份《大事记》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更多地理解章彬杰的身份和当时的处境。根据她本人的手写简历和个人总结，章彬杰的履历如下：

1949年初，燕京大学化学系毕业。

1949年4月1日，到北京女四中工作。教授全校化学课、初三、高一平面几何课，不久担任班主任和化学组教研组长。

1956年暑假-1960年，任女四中副教导主任。

1960年-1966年8月，任女四中副校长，分工负责教学和高三工作。

1968年1月8日-1970年6月，在北京朝阳中学任班主任，四连副指导员。

1970年6月-1971年8月，在朝阳中学分配组工作。

1971年8月-1973年5月，任朝阳中学教改组副组长。

1973年5月至1979年8月，任朝阳中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9年8月-1985年3月，任朝阳中学校长兼副书记。

从履历看，她既不幸又幸运。幸运的是，她挺过了文革前期的混乱，并在文革结束后出任朝阳中学校长。不幸的是，她是教会学校毕业生，而且在1966年文革爆发时已经在女四中副校长任上工作了六年。

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五七指示”）中说：“学制要缩短，教

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sup>1</sup>5月15日，五七指示和经毛泽东审阅的中央通知代拟稿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致通过，随后作为中央文件正式下发全国。所以，文革初起，学校首当其冲受到严重破坏，北京的中学领导人几乎统统被打倒。

章彬杰作为教会学校毕业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女四中领导人之一（“统治学校”！），当然在劫难逃。1966年8月2日她被关入校劳改队，不许回家，随时接受批斗。<sup>2</sup>据她的同事回忆，当时被关在学校的共10多位；其间一位老教师被校外的人打死，一位老师在物理实验室上吊自杀。<sup>3</sup>可以想象，章在劳改队期间经历了怎样的恐怖。10月份，她终于得到回家许可，但政治上依然处于被批判、被斗争的地位。

1967年上半年，北京女四中开始军训，下半年为“复课闹革命”积极准备。她的资料中有一份写于1967下半年的手写检查，并在首页标注了“用大字报贴出”字样，主体内容是检讨自己在过去十七年的种种“错误”。对于这份检讨稿的背景，她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整党中有所回忆：

66年文革开始，思想毫无准备。很快自己就靠边站，学生跟着就是全面否定了十七年的工作。当时自己全糊涂了。一方面对自己十七年的工作全否了想不通，但又为保自己，不能不随着形势推翻自己的观点和工作。入党前不但学习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而且也按着“党的驯服工具”那样做了，此时也全批判了。<sup>4</sup>当时社会上报纸上提

<sup>1</sup> 毛泽东（1966）：《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3-56页。

<sup>2</sup> 1966年8月2日，女四中四位教师贴出大字报，提出学校支部委员不应回家。章随即接到通知，当天中午回家取洗漱用品后，就进入劳改队。

<sup>3</sup> 参见廖伟章（2011）：《学校巨变亲历记》，<http://www.bjcjl.net/cjl/document.jhtml?viewId=1185>。

<sup>4</sup>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强调“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地方党组织的利益服从全党的利益，局部的利益服从整体的利益，暂时的利益服从长远的利益，这是共产党员必须遵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1958年6月30日在《北京日报》社谈话时，编辑问刘少奇，有人说党让做什么就做什么没出息，对于作党的驯服的工具有不通。他回答：“不作工具，作什么？作党的工具好不好？作驯服工具好不好？很好。”他号召每个人“像一个很精巧的工具，让党使用起来非常灵便，得心应手。”1967年4月7日，《北京日报》发表社论《打倒反动的驯服工具论》，批判“驯服工具论”。毛泽东读了这一社论，表示：“我从来就不同意驯服工具论”。各大报纸随即转载了这篇文章，电台一天广播6次。参见卜伟华（2008）：《“砸烂旧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第475页。



出的一些提法，由于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而识别不出。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怎样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sup>1</sup>把我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说对于我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又是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那我就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当然走的路可能就是资本主义道路了。但十七年中我的工作是在上级领导下，在校党支部领导下工作的，都是按上级指示做的，并且培养出来的人不少都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怎么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培养了接班人？十七年的工作难道一点是处都没有，全成了罪过吗？不清楚，不明白，但又不得不照着“风头”讲，宁“左”毋右，别犯立场错误。因此67年我在全校大会上的检查全推翻了自己十七年的工作。当时保自己还不是为了“名利”，也不是为了“乌纱帽”，而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争取早点得到“解放”，减少压力，少吃苦少受罪。<sup>2</sup>

可以想见，1967年章彬杰在不得不“深刻检查”自己十七年工作的情况下，见到了女附中的《大事记》。而女四中和女附中的很多基本情况是类似的，所以女附中的《大事记》内容对她写检讨非常有用。于是，她花费大量时间，完成了这份共计52页的《大事记》抄本。其中的部分内容，也改头换面地用于她1967年下半年的检查稿中。

章彬杰完成抄写工作后，肯定很珍爱这个抄本，所以，一直把这份抄本和自己的个人资料放在一起。直到我在旧书摊见到时，依然如此。

## 二、关于《大事记》的写作

<sup>1</sup> 章彬杰在《整党对照检查》中还写道：“通过这场文革，我接受的教训是，一定要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能力，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处处从维护个人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显然，她反思后认为毛泽东“五七指示”所说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属于需要通过学习识别的“假马列主义”。她这样分析的根据，来自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sup>2</sup> 章彬杰（1986）：《整党对照检查》，1986年2月。范世涛收集。

女附中的《大事记》完成于1967年6月。这正是文革最热闹的时候。所以，《大事记》的体例行文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中央文件和党报党刊的强烈影响。

《大事记》标题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实际上套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六个附件中第二个附件的体例。

这个附件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主持编写，题为“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该大事记1966年5月作为中央“五一六通知”的附件下发全国，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广泛流传于社会。<sup>1</sup>此后，编写“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逐渐蔚然成风。

开始的时候，群众组织编写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延续“五一六通知”附件所记时间范围，记录1966年5月或6月文革以来的事件。但毛泽东在1966年10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1949-1966年间的十七年问题：

“十七年有一件事，我看办得不好。原来的意见是考虑到国家的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现在我看不太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有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从十一中全会作了改变。”

2

在上述讲话中，毛泽东称1949年以来的十七年分了一、二线，结果“有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意思是说这些“一线”“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没有贯彻毛泽东的思想路线。不管这是否合乎历史事实，讲话扩散到社会上后，却刺激了群众组织将两条路线斗争的时间范围从文革扩展到17年。在1967-1968年间，涌现出建党战线、哲学战线、电影战线、文化战线、文学艺术战线、新闻战线、文教战线、教育战线、中学教育战线、出版工作、中国古典文学出版阵地、国外文学出版战线、科学技术出版战线、科研战线、科技战线、体育战线、卫生战线、医学教育战线、农村卫生战线、中医中药战线、经济战线、财政战线、

<sup>1</sup> 如北京师范大学“卅一人拿枪”战斗队根据孙友渔工作组传达的《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经过31人的回忆整理拼凑起来这份大事记，并在1966年11月20日油印发行。见红色老工人革命造反委员会红旗支队编印（196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2月，第1页。

<sup>2</sup> 毛泽东（1966）：《重要讲话》，1966年10月25日。北京朝阳区供销社红旗战斗小组翻印，1966年12月20日。

工资工作、工资福利工作、工交战线、计划经济战线、统计战线等多品种、多门类的十七年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在这些大事记中，1949-1966年间毛泽东支持和赞许的做法被称赞为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而与刘少奇或其他被打倒的人物沾边的，代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经过这样的政治检查后，历史事实按照时间顺序对照编排起来，就形成了各门类的十七年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这份北师大女附中《大事记》的基本框架也是这样。事实上，这也是那个时期编写新中国历史大事记唯一可行的办法。

在这份《大事记》的前言中，作者介绍了编写的目的：

为了全校革命师生在一起彻底砸烂修正主义教育制度，贯彻主席的“五七”指示，真正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把教育大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为了使同志们对我校十七年来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概况有一个简略的了解，以便进一步揭发、批判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女附中的罪行，捍卫毛主席的教育路线。为了有利于我校的斗、批、改，我们编写了这份《北京师大女附中十七年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初稿）》。<sup>1</sup>

这表明，编写《大事记》的根本指导思想来自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批判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女附中的罪行”可以看作贯彻“五七指示”、“捍卫”毛主席教育路线的具体行动。

虽然《大事记》的体例行文和指导思想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当时编写这份大事记其实隐含促进大联合的意义。前言这样说：

这个“大事记”是由《解放》、《肯登攀》、《众志成城》和东方红《放眼量》等战斗队（组）的部分同志联合组成的大事记编写小组写成的。由于我们毛泽东思想学得不好，

<sup>1</sup> 《解放》、《众志成城》、《放眼量》、《肯登攀》大事记编写小组（1967年）：《师大女附中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初稿）》，1967年6月。章彬杰抄本，范世涛藏。

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又因我们人少力薄，大多数同志是最近几年来校的，了解情况不多，很可能有观点错误或重要遗漏，希望得到广大革命师生的帮助、补充和指正。

所谓“我们毛泽东思想学得不好，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是参加编写工作的资深教师检讨语：“大多数同志是最近几年来校的”，表明作者大部分比较年轻。这些年长的和年轻的作者观点并不一致，所以分属四个不同的战斗队。为了“有利于我校的斗、批、改”，大家才联合组成了编写小组。要理解这个编写小组联合行动的具体含义，有必要对女附中的文革历史作简要的回顾。

北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的历史与北京城区的其他学校大同小异。1966年5月中下旬，校方按照宋硕代表北京市委所作的部署领导女附中文革，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66年6月1日晚播发了毛泽东称誉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宋硕代表北京市委所作的部署从此成了“‘三家村’黑帮”“负隅顽抗”的“阴谋诡计”，此前认真贯彻宋硕指示的北京大中学校领导（包括党团组织）也因此普遍受到严重质疑，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困境，大部分学校已经无法维持正常的教学。女附中也在此时陷入混乱，正常的教学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不过，这次混乱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上级很快就派来工作组，代替了校领导。工作组一方面将女附中校领导定为“黑帮分子”，一方面在女附中重新恢复了秩序。<sup>1</sup>这种局面持续了一个多月。到7月下旬，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派工作组的做法，新北京市委不得不在7月29日宣布撤销工作组。派驻北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也紧急撤出，工作组支持过的教师和学生感到自己犯了错误，女附中群龙无首，再次陷入秩序混乱。在各行其是的混乱局势下，积极或希望积极参与斗“黑帮”的学生在8月5日发起并残酷批斗了女附中领导层，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在这一天被殴打折磨致死。<sup>2</sup>

<sup>1</sup> 范世涛（2012）：《文革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以北师大女附中为例》，载《记忆》第82期，2012年3月31日。我最近收集的几页工作组时期整理的女附中资料称卞仲耘为“卞黑帮”。

<sup>2</sup> 胡志涛（1986）：《“八五”祭——一场史无前例的教育大摧残》，载丁丁、胡志涛《生活教育论》，合肥：安徽教育

为了建立最起码的学校秩序，8月7日女附中高年级部分同学召开“文化革命筹委会”会议，会上有人提议成立“红卫兵”，得到与会者响应。8月8日，女附中正式成立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sup>1</sup>但随着“破四旧”和全国大串连的迅猛兴起，同学们更加各行其是，秩序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女附中继续处于混乱的停摆状态。

中学长期停课，学生们四处“革命”制造混乱，显然不是一种能够长期持续的局面。1967年2月中旬，毛泽东派人调查总结了北京两所中学的军训经验，并对北京卫戍区的总结报告做出了批示。<sup>2</sup>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卫戍区在北京的中学普遍开展了军训。军训团按照军人的习惯和中央文件的精神，在军训中普遍强调组织纪律性，克服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希望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北师大女附中也在此前后开始了军训。1967年2月10日，四位军人来到师大女附中，准备军训。2月24日学校召开军训大会，但很多师生串连未归，只有五六百人参加。3月1日，女附中正式开始军训。3月4日，解放军表态支持女附中群众组织东方红公社。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女附中在工作组1966年8月初撤出8个月后，终于再次建立了秩序。

但是，同学们已经散漫了大半年，并不适应军训所要求的严格组织性和纪律性。而且此时文革动乱步入高潮，女附中师生不同的前期文革经历，使他们很难在各种问题上达成一致。所以，女附中通过军训恢复的秩序非常脆弱。外部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瓦解。

外部冲击很快就来了。1967年4月，北京的中学群众组织分裂为四三、四四两派。起因是一些军训团为了解决学校里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之间以及造反派红卫兵之间的矛盾，采取了解散学校群众组织的做法，引起造反派红卫兵的强烈不满。意见反映到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4月3日和4月4日做出侧重有所不同的讲话。随后，群众组织各取所需，有的批评军训团没有“坚决支持左派”，解散造反派组织是错误的，

出版社，1996年，第134—143页。

<sup>1</sup> 李红云（2013）：《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从一份原始记录说起》，载《记忆》第102期，2013年9月30日。

<sup>2</sup> 毛泽东（1967）：《关于派人调查总结北京两所中学军训经验的批语》、《对北京卫戍区关于在大、中学开展军训的两个总结报告的批语》，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31页、236—237页。

这是“四三派”观点；另外一派（“四四派”）认为军训团已经支持了左派，军训的各种做法好得很。<sup>1</sup>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女附中在1967年3月短暂恢复的脆弱秩序在4月份迅速瓦解，群众组织再次活跃起来，每个群众组织都努力通过大字报表达自己的观点。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四个观点不同的群众组织部分教师联合起来，共同完成了这份《大事记》。这可能反映了军训团秩序瓦解后，教师们希望借助学习和贯彻毛主席“五七指示”，清理1949-1966年间北师大女附中历史来明确斗争和批判目标，实现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重建学校秩序的诉求。

几十年过去，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浩劫”已经被“彻底否定”，文革时期被打倒的领导人也先后恢复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面貌。《大事记》按照当年的中央文件和党报党刊做出的政治评价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但是，由于《大事记》编写小组由年龄不同、观点不同的教师联合组成，这份《大事记》的取材比较广泛，内容比较充实可靠，派性色彩并不浓厚，批判性语言也相对节制。《大事记》所记录的事实，现在仍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

### 三、《大事记》的独特价值

作为一份历史文献，《大事记》可以从多个角度来阅读和使用。我个人感到，在以下两个方面《大事记》的价值比较独特。

首先，这是女附中重要校史资料，也是总结十七年教育、探究女附中文革发生原因的珍贵文献。

北师大女附中的历史近年来之所以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主要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北师大女附中是文革初期北京最早派驻工作组中学之一，而且工作组工作得到了中

---

<sup>1</sup> 卜伟华（2008）：《“文化大革命”中的北京“四三派”和“四四派”》，载《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2期。



央一线领导人的直接指导。二是女附中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在1966年8月5日被学生们欧打折磨致死，调查事件经过、探究事件原因，对纪念文革遇难者、正视和反思历史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三是毛泽东1966年8月18日接见百万革命师生群众时，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了女附中高三同学宋彬彬的红卫兵袖章，这件事在文革史上具有重要象征意义。

通过北师大女附中多位校友多年来独立进行的深入调查，我认为这三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大体比较清楚。<sup>1</sup>公众虽然还没有充分理解和接受，但这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在探究卞仲耘之死和女附中文革发生原因过程中，学界形成的一个普遍认识，是有必要放宽视野，探究同学们的成长和受教育经历，进而检讨十七年教育的得失成败。而这本《大事记》正是以十七年女附中教育为主题，在准确的时间框架下，要言不烦地记录了女附中1949-1966年的领导体制、组织架构和教育方针的演变，也记录了学校在这段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从而为检讨和研究1949-1966年间的教育提供了系统的微观个案材料。

从《大事记》来看，女附中成立后就按照毛泽东思想，“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建立了革命新秩序。在此之后，每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女附中师生均参与其中。我们可以对《大事记》提到的政治运动作扼要的列举：

“1950年抗美援朝，师生共同批判亲美、恐美、崇美思想，上街头宣传，去山区演出。1952年三反运动，9位员工受到审查，庶务李玉田先被斗争后被逮捕法办。思想改造运动，师生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雇佣观点，号召忠诚老实，交待个人历史问题。1953年教育部制定中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全盘采用苏联教育计划和相关教学大纲，女附中当然照办。1954年学校党团内部传达学习关于高饶事件的决定。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语文教师胡

<sup>1</sup> 讨论北师大女附中文革的文章很多，有些文章与原始资料（如文革时期女附中师生的日记，笔记，大字报选，大事记）出入很大，以下是事实基础比较牢固的文献：胡志涛（1986）：《“八五”祭——一场史无前例的教育大摧残》，载丁丁、胡志涛《生活教育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4-143页；Weili Ye（叶维丽，2006）：The Death of Bian Zhongyun（《卞仲耘之死》），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13（2），Fall 2006；冯敬兰主持（2010）：《也谈卞仲耘之死》，载《记忆》第47期，2010年4月28日；宋彬彬（2012）：《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载《记忆》第80期，2012年1月31日；李红云（2012）：《北师大女附中文革和工作组》，载《记忆》第90期，2012年11月；叶维丽（2013）：《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载启之编《故事不是历史》，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4月版，第52-66页；李红云（2013）：《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从一份原始记录说起》，载《记忆》第102期，2013年9月30日；李红云（2014）：《关于女附中的红袖章和公章》，载《记忆》第112期，2014年4月30日。上述文献虽然紧紧围绕北师大女附中，实际意义远远超出女附中范围，可称得上现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收获，值得向大家认真推荐。

莽以嫌疑身份入狱，肃反运动中6位员工受到审查和斗争。”

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后：

“我校成立了反右斗争五人领导小组，成员有胡志涛、吴秀、卞仲耘、康辑元、白耀，最后定为右派分子共12人，其中党员1人，一类右派2人，二类右派2人，四类右派2人，五类右派4人，六类右派2人，中学生没有参加教师范围内的反右斗争，中央规定不在中学生中划右派分子，我校对高三学生中有右派言论的，进行了组织处理，问题严重的开除了团籍。”<sup>1</sup>

1958年暑假教师团支部进行整团，开展红专辩论；8月份市委讨论毛主席教育方针，副校长胡志涛提出不同意见受到斗争，被打成“反党分子”到工厂劳动。暑假之后学校掀起教育与劳动相结合高潮，师生到区县深翻土地，到工厂去劳动，在校内建土法炼钢炉。1959年传达和学习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决议，同学们群情激昂；同年底，党内整风，反右倾机会主义，总支开展大批判。1960年学校组织超声波、无线电、原子能、半导体小组。大饥荒时期学校大搞蘑菇、人造肉、小球藻。1963年开展学雷锋运动、“五反”运动。1964年贯彻毛泽东春节谈话，搞教育改革；十七级以下党员干部会上揭发校领导阶级路线等方面的问题。1965年贯彻毛泽东“七三”指示，各教研组分别组织文艺界两条路线斗争概况、关于中间人物、李秀成批判等讲座。1966年大搞备战活动，开展防地震防空演习，成立防空指挥部；同年2月，全体党员发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大家无限欢欣，决心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这些记录清楚地表明，女附中在1949年后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组织，还通过连续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成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一个基层政治单元。在这个单元里，校领导、教师和学生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和参与了现实政治。无论这些政治活动是否正确、是否必要，事实上构成了女附中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sup>1</sup>《解放》、《众志成城》、《放眼量》、《肯登攀》大事记编写小组（1967年）：《师大女附中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初稿）》，1967年6月。章彬杰抄本，范世涛藏。

这种既是教育单位，也是政治单元的架构实际上是发动文革的体制基础。比如，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后，师生批判亲美、恐美、崇美思想，上街头宣传，去山区演出，这种场面与文革时期师生口诛笔伐修正主义，在街头、去外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就非常近似。至于说三反运动、肃反、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也在文革中可以找到高度近似的场景，只要把政治定性以及批判对象、宣传对象替换一下就可以了。

当然，文革来势更加凶猛，运动开始不久校领导就基本上个个被打倒，学生们也在文革中发挥了比以前运动更加重要的作用。而且，文革前知识教育在学校仍占居主要地位，用卞仲耘的话说，“学校里不能喧宾夺主，让其他把学习占了”、“不好好学习，就不要挂学校的牌子了”<sup>1</sup>；文革开始后，政治压倒一切，毛泽东思想成为观察一切、检查一切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知识退居无足轻重的地位。基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让路和服务、为毛泽东思想让路和服务，成为文革时期教育的核心特征，无论停课放假闹革命还是复课闹革命，都是如此。

其次，《大事记》是观察中央、地方和基层互动关系的重要窗口。

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决策的过程非常封闭。要真正了解这个过程，主要依靠档案解密和当事人回忆，尤其档案解密更为根本。遗憾的是，现行档案制度主要承袭前苏联传统，主要服务于秘密的守护和宣传的目的，档案的开放利用被置于次要得多的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史研究者目光向下，转向社会史和地方史研究。但问题依然存在：毛泽东时代每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职业途径都受到了中央和地方政策的强烈影响，每个单位都不是现代社会可以横向自由联合、相对独立存在的法人单位，而是列宁所谓国家辛迪加的一个单元。如果缺乏上中下关系的叙述，有关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单位或地方的叙事也就缺失了关键性的部分。但要打通上中下关系，势必再次遇到决策过程不透明和档案不开放的瓶颈约束。

<sup>1</sup> 卞仲耘 1965 年 10 月 14 日给高三学生做的贯彻“七三”指示的报告。转引自《解放》、《众志成城》、《放眼量》、《肯登攀》大事记编写小组（1967 年）：《师大女附中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初稿）》，1967 年 6 月。章彬杰抄本，范世涛藏。

这份《大事记》有所不同。编写小组虽然重点记录的是一所中学的变迁，但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中学的变化与中央、地方的人事及政策变化很好地结合起来了。比如，在文革发动阶段，北京市委就被毛泽东指责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北京市委1949-1966年间的主要活动在文革发动起来后被系统清理。所以，《大事记》除了记录毛泽东、刘少奇、彭真、陆定一、周扬、乔明甫、刘皑风、童大林等中央领导和部委领导对女附中的影响，还记录了万里、宋硕、李琪、张文松、李晨、侯维成等地方领导对女附中的影响。这样一来，这份《大事记》就为上中下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窗口。如果进一步补充女附中校友的回忆，就可以形成从中央到地方到学校再到学生的完整链条。

最后，我想说的是，目前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校友正在集体回忆，写作她们所经历的女附中。这份《大事记》提到大量的人或事，或许会唤起大家更多的回忆，进一步充实北师大女附中的历史，进一步形成理解那个时代一个基层单位的完整故事。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以师大女附中为舞台，可以展开对当代历史的宏大叙事探索。■

2015年7月12日初稿

8月9日定稿

## 【评论】

## 林彪的四大经典马屁评析（一）

不平

## 一．引子

李作鹏先生在《回忆录》中，对林彪的描述甚为到位，最后一段，尤为传神<sup>1</sup>。

林彪对毛泽东的拥护，比谁都早，比谁都坚决，比谁都积极。毛泽东顺境时他拥护，毛泽东逆境时他也拥护。林彪遭到毛泽东严格批评时，仍然拥护毛泽东。他是毫不动摇，几十年如一日拥护毛泽东的“顽固分子”，“死硬派”。可是最后拥护毛泽东是“天才”，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本来是“名正言顺”，为党为国的忠诚好心，开始毛泽东也说是“顺流”，不是“逆流”，“四月出现顺流，八月出现逆流”。以后却出乎意外的变了，“拥护”变成错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烈马扬腿一脚，把林彪踢翻了，落在臭水坑里，惨不忍睹，臭不可闻。

四大金刚的说话常常如此，说出了实话，但这话上面，却又涂上了一点涂料。故而听的时候需要把上面的涂料刮去，便能知道真意了。李作鹏先生的话也是如此。其实说的是，林彪对老毛：老毛对的时候拍，老毛错的时候我也拍，反正你的马屁我是拍定了，一辈子以拍马为业，最后也葬送在马屁上。林彪，靠拍马起家，因拍马倒台。虽然曾经因拍马而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亿人之上，九五之尊，只差一步就要到手，最后却是因拍马而“落在臭水坑里，惨不忍睹，臭不可闻”。

<sup>1</sup> 《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883页。

稍有良知的人，自可以以林彪为例，教育子女，诫勉后人，你们当以林彪为鉴，要做老实之人，莫作拍马之徒。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马屁拍得多么好，莫看你今天拍马了，得到好处了，说不定明天就完蛋。你马屁再好，好不过林彪。

林彪的座右铭是：“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这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细细分析起来，林彪此言并不确实。细数中国，谁人不“大拥”，谁人不“大顺”？又有谁敢不“大拥”，谁敢不“大顺”？刘少奇不“大拥”？周恩来不“大顺”？林彪之黠，在于他还有一个绝招，那就是：大拍。这大概也应了一句歇后语：猫教老虎。林彪也是这样，即使是私房话，这一绝招也是不肯露底的。拥林派说，林彪是“主席画圈我画圈”，其实，这是中国官场通例，并无林彪特色。主席画圈了，谁敢不画圈？除非你是吃了豹子胆。当然，中国吃豹子胆的人还是有的。彭德怀就是吃豹子胆的。刘少奇也吃过一阵豹子胆。总的来说，大拥大顺，“主席画圈我画圈”并非林彪特色。林彪的特色，在于大拍。中国想拍马屁的人多着呢，但是，像林彪这样拍得有水平，以拍马为业的人不太多。毛泽东当年在给雷锋同志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后的感言中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其实中国的老百姓中，一辈子做好事的人有的是，所以，这并不是难事。真正的难事是什么呢？应该说：“一个人，拍一次马屁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拍马屁，不做他事。”刘少奇没有拍过马屁么？周恩来没有拍过马屁么？但是，像林彪这样，一辈子拍马屁的，确实不容易找。林彪是有会必拍，无言不媚。郭沫若，也是拍马高手，人称四大无耻之首，尤其在文化革命中。但是，把郭沫若与林彪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了。

当年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是不能相信的，因为这是马屁。马屁当然不能信，谁信谁完蛋。罗瑞卿和田家英当时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所谓“顶峰”，最多也就“顶”了那么十几年。然后就不



是什么“顶峰”，而是“晚期错误”了。不过，顶峰还是有的，林彪的马屁就是马屁学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屁学。这可不是马屁，而是事实。你去查查历史看，有谁的马屁能够与林彪的马屁媲美？今后，当然也不会有了，就像文化大革命，今后不会再有了。林彪的马屁给人类打了预防针。今后，只要有类似的马屁出现，人们就会问：“你是不是林彪？”然后，就会群起而攻之，就像一个病毒出现，白血球就会增多一样。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林彪一生，战役甚多，不乏经典，世人的论析亦甚多。林彪一生，马屁亦甚多，其中经典有四：59年庐山会议上的讲话，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文革中66年的“5.18”讲话，70年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老毛当年说，文化革命要每七八年搞一次，这林彪是，大屁每三四年必有一个。本文便对这四大经典马屁，分别以年记之，加以评析。本文原题为《论拍马之道与林彪之败》，不谈主观动机，是否要倒彭倒刘，不论效果如何，是否主要次要。只从马屁的角度进行评析，就如同武术评点，何处是点到要点，何处是尚有破绽。

## 二. 59年庐山会议上的马屁<sup>1</sup>

59年，三面红旗，多快好省，大跃进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有彭德怀引民间词为证：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的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1959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会上对如何估计国内形势问题产生了两种意见分歧，有些人认为农村食堂、供给制、“共产风”等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应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1958年的经验教训；另一些人对于批评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很不满，认为是泼冷水，是右倾。7月10日，毛泽东在组长会议上讲话，强调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是不会错的，并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7月14日晚，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批评了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7月16日，毛泽东

<sup>1</sup> 本节除黄克诚的回忆外均引自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页码不另注。

突然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随后，会议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7月17日，林彪登庐山。7月23日，老毛讲话：

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地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假如办10件事，9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那时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30公里。

《庐山回忆录》中记有林彪8月1日和8月4日两次发言。

我们先来看看会议的亲历者李锐先生是怎么描述8月1日常委会的：

林彪是7月17日上山的，当然是搬来的“救兵”。可能已决定让林接管军委工作，但这次会上还没有同意彭德怀辞职。林彪开始只讲了几句话，可谓“击中要害”。为整个即将召开的全会和斗彭纲领定了调子。林彪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他讲这几句话时是声色俱厉的。

下面，是李锐先生记录的林彪讲话：

表面似好意，实际要抓辫子。地下档案，控告书，告党状。发表以争取群众，不发则存档。表面似好意，而用意很深，是坏意，表现个人单独政治见解。内容与形式总相反，采取迷人办法。事实证明是右倾，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几十年不写信，哪有如此简单（毛泽东：经过小舟造空气，说什么讲话不自由），攻击主席，今后动机搞单纯一些；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增强党性，把相信自己减少些。做法人家知道的，内容与形式都知道。要靠老实办法，学毛主席著作。马克思主义著作与毛主席著作是联系实际的。政治上不再搞另一套，自以为有正确东西。只有中央和毛主席一套正确，用这一套正确指导革命。不搞理论，兴趣不高，也非嗜好，这不是文化程度问题。哲学、世界观、政治，要学现在一套，自己搞一套不行。加强组织观念最重要。抛掉个人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搞大局面，自己一套拿出来。这种雄心、信心没有；缺点是有暮气。主席讲元帅中有暮气。这样大局面，理论知识、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毛泽东：66岁了，随时准备打交道，准备后事。）都是丘八，就是那么个材料，那么大作用。都要注意，最要紧防止自信、个人英雄，否则就不能尊重党，尊重马克思主义，更不能相信元帅。

8月4日发言：

大家都看到彭的信，骤然一看，还不大容易看得出其精神和用意。信发出来后，在会议中引起了思想上的不一致。过细一读，有很严重的错误。除信以外，他还在小组会里讲了很多暴露观点的荒谬言论，还有会外的活动。总的方面是右倾的，是反对总路线的，反对大跃进的，反对人民公社的。他是夸大缺点，否定成绩的，对于大办钢铁、办人民公社，都持否定态度。他散布的情绪和言论都是泼冷水的、松劲的。他虽没有提出毛主席的名字，

但是在前前后后，会内会外的讲话，字里行间，攻击的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反毛主席，反对党的领袖。对于总路线，他只是讲“基本正确”。党内习惯用法，说基本对，那么就还有不对。这样的话绝不是冲口而出，而是很有分寸的。在这些话里，埋伏要修改总路线、动摇总路线、推翻总路线的观点。我们说总路线正确，大跃进成绩很大，办人民公社、办钢铁办得好。这中间当然在某些具体措施上面有些不恰当的地方。从去年9月起，一次又一次的中央会议，毛主席的信，这些部分不妥当的地方，中央都及时纠正了。可是他却认为我们认识过迟了，而且没有及时调整。这些问题的发生，他不认为是我们一些机关工作的责任，而把责任完全推到党中央身上。他有很清楚的句子：“计委虽然有安排，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难于决断。”这个话就有伏笔。计委之上还有谁呢？领导经济建设的当然是毛主席，所以他在这里很显然是影射毛主席。他还说“有失有得”，哪里是有失有得呢？他说的其实主要是失。我们说主要是得，部分损失。所以他这样倒过来说，是有文章的。他在小组会中很多插话都是散布右倾思想，觉得还不够，所以要写信。说庐山会议讨论不够，民主不够，他要发动讨论。实际上他在会外讲，华北座谈会操他40天娘，这次他不可以操20天娘吗？所以总的目的是为了操娘，为了骂党，骂中央，骂毛主席。他把我们一时的局部失调，夸张得很大，认为影响到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各阶层之间、什么什么之间的关系，而且是政治性的，是政治路线的错误。他夸大了各地的浮夸作风和所受损失。对于去年我们广大的群众运动，他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实际上这样广大的群众运动是中国一穷二白的真正产物，是广大人民在党领导下想翻身的一种产物，这是必然的产物。他是打着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的旗帜，来向党进攻，向毛主席进攻。。。。他说1070万吨的指标没有经过中央讨论就决定了，这显然是反对毛主席的。他还说，公社化引起的问题，是主席应该负责的。他还说，我们得意忘形，头脑发热，毛主席在上海也作了检讨的。他说庐山会议有压力，大家不敢讲话。他说，几个月不供给油，是主观主义的。他还说，第一书记挂帅，这也挂帅，那也挂帅，他实际上是反对第一书记挂帅，反对党的领导。他不仅仅是指的各省，实际上也是指的中央，指着毛主席。他发信之前，跟人

说，这封信对毛主席是有刺的。可见，他主要是要刺激毛主席。他说很多同志在会议中不勇敢发言，这是软弱。照他的意见，照他的办法，就是要拼命向党进攻；不向党进攻，就是软弱。写信正是为了公布他的政治纲领。所说要提倡勇敢讲话，是要提倡赫鲁晓夫的精神；要脱裤子，并且要自己脱，不要人家脱。以上就是他在信内、会内会外所表现的东西。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留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他参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个人野心。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毛主席无论在天资方面，学问方面，事业的成就，工作能力，马列主义的水准方面，更何况思想意识，在哪方面他能比得上呢？但是他太自不量力了。他这个人功归于己，过诿诸人。他平时摆出张飞的面貌，坦率的面貌。在生活上比较朴素，比较检点，这是他的长处。大家看问题容易从小的方面看，在这方面，他是迷惑了人的。毛主席说，跟他的关系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三七开。我在长征时看得很清楚。当时他一肚子意见，到处同人讲，同他的政委讲，在司令部讲，还同底下的人讲。要他报告中央，写好电报，他又不签字。毛主席说，他是老于世故。他说自己有时说话走火，也说自己是老奸巨猾。

毛主席这次对他的问题，他的思想，看得很重。他的这一套，在这次会议暴露出来，是我们党内一种右倾的政治危险，发展下去，是极其危险的。那会动摇、破坏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另一方面从长远来说，他是我们党里面的一个隐患。毛主席说，去年5月间讲党的分裂问题，主要是指他。

在披露了林彪的这些讲话后，李锐先生还有下面文字：

这个晚上的通气会，从7点30分到11点，林彪讲话占了一多半时间。通篇没有称呼一个“彭德怀同志”，只以“他”代替。其他三个常委都称“彭德怀同志”。从这个细

节，可见林彪把界线划得何等分明。关于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这是林彪在常委会上定的调子。这时却不直接讲出，而是说，其他常委有这样的看法。

后面也说到：

8月3日起，按照毛泽东讲话精神和常委会定的基调，6个小组进入揭批“军事俱乐部”的新的阶段。4日晚上，听到常委传达尤其是林彪的讲话之后，当然更深入到“实质性”的问题：“武文合璧”，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地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要按照“右倾机会主义”的面貌改造党；彭德怀这个人是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历史上一贯犯错误，同毛主席三七开，这次要算历史总账。

黄克诚在《黄克诚自述》一书中作相似的回忆：

林彪发言说彭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说彭自己有一套纲领，路线，独断专行，攻击主席，用心很深等。这个发言很厉害，以后成了定性的基调。

（8月2日）接着就是各组开批斗会，批“军事俱乐部”进入高潮。康生是批斗中最积极的人，又是发言，又是插话，又是整理材料送主席，拚命地表现自己。林彪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8月4日由少奇同志主持一个会，向新上山的中央委员通气，林彪第一个发言，长篇大论地指责彭，占了一大半时间。

这第一个经典马屁，特点是“挑”，挑动老毛对彭德怀的对立，仇恨。短短四百多字的一段文字，有几顶帽子：“反毛主席，反对党的领袖”，“影射毛主席”，“骂党，骂中央，骂毛主席”，“向党进攻，向毛主席进攻”，“指着毛主席”，“刺激毛主席”。要知道，在中国，杀人放火不算恶，反对老毛最最恶，那是要诛之讨之，千刀万剐，满门抄斩，断子绝孙的。林彪的扣帽之术，即使是文革中的红卫兵，也要自叹不如。再看老毛，一搭一唱，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当然，关于会理会议的一封信，林彪承认自己所写，也可算是天良没有丧尽。李锐先生是如此说的：

谈到会理会议时，因当事人面对面，林彪不能不说实话：他当时写信给中央，要毛、朱、周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指挥作战，事前并没有同彭德怀商量过，与彭德怀无关。这使彭德怀得到点安慰：总算澄清了20多年的一个误会。

值得一提的是，8月4日，在传达中常委8月1日，2日谈话的时候，林彪开首便说：“我是先到的援兵，你们是最后到的一批援兵。”林彪是7月17日到达庐山的，故称为“先到的援兵”。先到的援兵中，还有黄克诚将军。同样是援兵，黄克诚沦为“军事俱乐部”的二号人物。8月17日，与彭德怀同时解职。同日，林彪接任国防部长。罗瑞卿接黄克诚任总参谋长，张平化接周小舟任湖南一把手。算是论功行赏吧，或者，也可以说，论屁行赏。民主国家，要上位，靠竞选，中国特色，要上位，靠竞屁。这老毛也真是赏罚分明：进言者打入十八层，进屁者封入凌霄阁。

### 三. 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马屁<sup>1</sup>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遭批，“左”祸继续泛滥，1959年下半年至1960年上半年，也因此成为中国经济灾难深重的一年。当年的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讲话中说：“我到光山（信阳地区的一个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1998年邓力群回忆说：“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讲：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

<sup>1</sup> 本节所引刘少奇，林彪讲话，均来自张素华所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作会议，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参加，共 7078 人，故称“七千人大会”。其规模之大，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至今也是没有过的。当时形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形势，中央在进行调整工作时又遇到了困难，干部群众的思想比较混乱，粮食问题又是火烧眉毛般的危急，再加上赫鲁晓夫的压力。1 月 27 日，刘少奇发表讲话，即，影响巨大的《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一篇讲话，力图把失控的火车头的方向扭一扭，当然没有成功。这一篇讲话，也影响到了刘少奇本人的命运，这已是人所皆知了。下面是刘少奇讲话：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 1959 年、1960 年、1961 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 1961 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 40%，或者还多一点。1962 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



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但几年来在执行中有偏差，主要是更多地注意了多快，注意好省不够。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番，……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还看不那么清楚，不那么明显，……人民公社可以增加积累，……将来要实行机械化，这些一大二公的好处，要再过若干年，才能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对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不能只根据现在的情况去断定，而应该看它将来的发展前途。……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我们说，人民公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也会采取这种组织形式。……现在看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题是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不要搞得太急。应该经过典型试验，……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我们办人民公社的主要经验教训，也就在这里。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在回答关于彭德怀的问题时，刘少奇一方面坚持“彭德怀的问题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一方面也说到：“从那封信的表面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

老毛听了这一篇讲话，感觉如何？读者诸君应该不难想象。江青说得很清楚：“憋了一口气”。1月29日，林彪讲话，也就是，影响同刘少奇讲话不相上下的62年马屁。不仅影响到了共产党的政策走向，影响到了亿万人民的命运，而且影响到了林彪本人的地位变化，若干年后的副主席，接班人，可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诸位请听：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林彪在这里有意回避了是毛泽东的创造-引者）……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干劲的做法，不争上游的做法，少慢差费的做法。……总路线本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组成部分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抓到一个方面，丢掉了其他方面，那就不好了。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在开始阶段，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把过去初级化、高级化的优点都集中起来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在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确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我们的的确确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

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

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就像小学生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上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

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这个马屁拍得，可谓是龙心大悦。林彪讲完，老毛当时就带头鼓掌，对林彪的讲话给予了充分肯定，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这次大会上，其他在大会讲话的人，毛泽东都没有给予评论，唯一称赞的，就是说林彪讲得“很好”。吴法宪作如下回忆：

听了林彪的讲话，毛泽东的兴致可高了。在林彪讲话时，他一直显得神采奕奕。林彪一讲完话，他就接着讲话说：“林彪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发言。林彪同志经过调查研究、慎重考虑和分析，作了这样一篇重要的讲话，大家可以好好的研究、考虑。”

3月20日，毛泽东再一次看了林彪的讲话之后，批示田家英、罗瑞卿：

“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当时中央办公厅在下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时，曾有一种意见考虑，林彪主要讲的是军事问题，里面有些机密内容，似不宜下发。毛泽东批示：“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下发。”毛泽东于4月29日、30日在武汉同罗谈了两次话。他问罗：“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你能不能讲出这样一篇来？”罗答：“我水平差得远，恐怕永远也讲不出来。”毛泽东说：“讲不出来，可以学嘛！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提纲去讲的。我也是这个方法，在会上边听边想边写提纲，最后就按提纲去讲一遍。”

作为比较，再看看邓小平的表现。邓小平2月6日讲话，从16时38分一直讲到18时。多次提到刘少奇的报告，并且说刘少奇的报告是不容易的；也多次谈到毛泽东的讲话，说是有深远意义的。但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林彪的讲话，更没有讲什么“三面红旗”是正确的，犯错误等于付学费，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等等。邓小平也没有像刘少奇那样慷慨激昂，他甚至从头至尾就没有涉及“三面红旗”问题，也没有讲成绩和错误的比例，更没有讲天灾、人祸的问题。吴法宪有如下回忆：

然后，毛泽东又请邓小平讲话。邓小平讲了党的工作、民主集中制等问题，但对林彪讲话没有表态。毛泽东接下来请陈云讲话，但陈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好讲的。”毛泽东马上语含讥讽地说：“陈云同志向来谨慎，是不轻易讲话的。现在还没有要讲的，到要讲的时候再讲。”

这第二个马屁的特点是“扭”。何以为“扭”？扭败为胜。何以扭败为胜？无非是颠倒黑白。你要说它不好，我偏要说它好。所需要的，也就是一点：昧了良心，唯毛为上。如果说，刘少奇的讲话让老毛憋了一口气，那么，林彪的讲话就是让老毛出了一口气。这就是老毛最需要的，唯独林彪可以胜任，无人可以替代的。马屁人人会拍，高低水平不同。这林彪的水平已经是出类拔萃，无人能及。如同李世民所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你说，这老毛要是选接班人的话，不选林彪选谁？这马屁要拍得人受用，拍得人舒坦，庐山会议上的马屁，“七千人大会”上的马屁，乃是老毛感到最为受用的马屁，乃是马屁中的经典之作。三年之后，犹且念念不忘，回味无穷。1965年冬罗瑞卿到上海晋见毛泽东后，说他准备去苏州看看林彪。老毛旧事重提：“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3个小时的报告。”马屁能够拍到这个份上，评为顶级，不为过也。如果今后有《马屁经》出版，59年和62年这两个马屁是一定要收录的。■

【口述】

## 回忆周总理“五九接见”

李春光口述/文靖撰写

1970年5月，中央决定除“样板团”之外的北京各中央直属艺术团体、院校一律下放军队农场。下放前十天，5月9日，晚十一时许，周总理在中南海召见各单位军工宣传队负责人、单位负责人（“革委会”、“大联委”[“大联合委员会”]负责人）和群众代表，约两百来人。

总理一落座，就提出音乐学院问题。没问几句，就说“得听听李春光的。”

我站起来。

总理说：“你到前面来嘛。”

（这里可能需要做一点解释：一九六八年七八月间，解放军、工人宣传队进驻高校，凶神恶煞，不可一世，动不动“毛主席派我们来……”。【当时发表“最新指示”：“宣传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来……并且永远领导学校。”】但是，没过多久，我同宣传队领导发生激烈冲突，一再逼我认错检讨，遭拒【我确实没有错——这是另一个故事，说来话长，有空再讲】，遂于次年【1969】三月一日晨把我抓进“黑帮劳改队”实行“专政”。我绝食抗议，到第四天，父亲急了，给总理写一不足千字的短信，请求其单位军代表转呈，经几小时研究、请示后，答复说：宣传队由毛主席亲自派驻，我们不能插手，最好由你本人直送总理。当天傍晚，父亲把信送去，总理即要秘书打电话到音院，要求放人。工宣队长顶牛不放，说：死了人杀我的头。次日下午，文化部系统军宣队副总指挥【某野战军副政委】到音院，据说拍着桌子发了很大脾气。又到隔离室来看我，态度非常和气。我同他讨论区分“两类矛盾”问题，我说：如果一时分不清，就应该先作为内部矛盾处理，否则会使自己陷于被动——“捉人容易放人难”啊……他高兴地说：李春光同志，你思想水平很

高嘛！【不久前发现，那谈话记录居然还在。你有兴趣可以看看。】他叫来一位军医，为我静脉注射葡萄糖并开车送我回家。几天后，我写了一篇《评“三一事件”》，批评宣传队“转移斗争大方向”【这篇文章底稿现也还在】。不久，总理办公室值班秘书吴庆彤【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到音乐学院调查数日，也找了云德海【音院青年工人，群众组织“北京公社”头头之一】和我，长谈两小时。数月后，一天下午，突然召开全院大会，音院军宣队长林世昌和文化部系统军宣队总指挥张光【某野战军军长】分别宣读两篇检讨，说“三一事件”犯了“方向性错误”。）

总理把我叫到跟前，说：“你是国务院参事李一平的儿子嘛——你看，你家里我都晓得。”（父亲从抗战时期起同总理、董老等共产党人多有交往，1950年以“教育界特邀人士”出席首届政协，后任政务院-国务院参事。）总理问：“你今年多大了？”答：三十岁。总理反应非常之快，立刻说（没有片刻间隙。我当时就颇感吃惊）：“解放的时候才上小学嘛。小学，中学，大学，你是‘两门干部’。不过，学校也可以算机关了，你也是‘三门干部’了。”（所谓“三门干部”，指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门、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又问：“你学什么？声乐还是器乐？”答：学理论，总理说：“哦？你是理论家啰。实践了没有？”我愣住了，答不上来，总理说：“理论，还要实践。写过什么文章吗？”我说：写得很少，水平很低。总理又问：“下过乡吗？”我说：参加过四清。总理问在哪里四清，我说先在通县后在衡水——就是曾经发生地震你去过的那个地方。总理于是问起四清中的一些事，说到“（王光美）桃园经验”、“二十三条”，等等。这时有人要求发言（大概觉得我对总理说些无关紧要的话太耽误时间），总理说：“你不要打断，我同他多谈几句嘛。”其间不知怎样谈到“四条汉子”，总理问：“你知道‘四条汉子’是怎么回事吗？”“鲁迅那些文件你读过吗？”（他不说“文章”而说“文件”，我觉得新鲜，因而印象深刻记忆清晰。）我说读过。总理又问：“怎么读的呢？”我说：家里有一部《鲁迅全集》，从那里读的。总理说：“还是因为你父亲有这方面的接触了。很多人不晓得。”后来再次谈到“四条汉子”，总理说：“比如李春光，今年三十岁，解

放的时候才九岁嘛，他跟‘四条汉子’有什么关系呀？”（有批判会曾说我是四条汉子“孝子贤孙”。总理很可能从秘书调查中得知。不过，他此刻这样讲，无疑是说不要给年轻人乱扣帽子）又问：“你们（指“北京公社”）一共有多少人？”我说三十几个。总理问：“都没有‘下山’吗？也不参加他们的学习吗？”（当时号召“大联合”，宣传队主持建立了“大联委”，我们认为以多数派吃少数派，拒绝参加。）我答：都没下山，也不参加他们的学习。总理说：“看来你们两派影响都不大。”接着问起音乐学院一些事，非常仔细、准确，没有弄错一件事情，没有说错一个名字，我当时就很惊讶。总理指着我对大家说：“他们给我送来很多材料，摞起来有这么高，我都认真看过。”（抬起左臂，两手掌心相向，相距尺许。后由国务院办公厅整理下发的谈话记录稿【题为《总理五九指示》，八开白纸小字复写，约十来页】中记为“**摞起来有尺把高**”。）总理说：“‘S、F、S、W’这四个人比较注意了，但是一定要把材料搞清楚。”（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但是我们为什么事情上报“S、F、S、W”？记不清了。总理还就音乐学院另一些事说了一些话，也记不准确了，故从略。）又谈到宣传队问题，云德海要求发言，激动地说驻音院宣传队犯了许多错误却拒不检查。总理皱起眉头，抬头看看云，说：“怎么没有检查呢？他们两篇检查稿子我都看过的嘛。……年轻人，敢于提意见是好的，但是，也要懂得尊重领导。领导，总是经验多一点嘛。领导当然也会说错话，谁不说错话呢？不要抓住一句错话就没完了。”他是两头做工作，后来问一位工宣队员：“你今年多大了？”回答说四十六岁，“是党员吗？”回答“是”。总理说：“老工人，老党员，就要懂得爱护年轻同志。列宁说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是可以原谅的’嘛。……不要说起话来硬梆梆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十二届三中全会讲话录音，你们都听过嘛，那是多么慈祥。”又说：“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也是这样的嘛。”我在总理跟前站了半个多小时（吴庆彤给我搬去一把椅子，我没坐），谈音乐学院的事情大约二十几分钟，最后，总理问：“你看这些意见能不能供你们参考？”我说：总理的话完全符合实际，我们一定照总理的指示办。总理摇摇头，说：“不要说‘指示’。我只是建议。我也不了解情况。不知道什么时候说错一句话，又要贴



大字报了。”随后示意我坐下。

其间韩念龙（外交部副部长）三次进来，把一些文件放在总理面前，一句话不说，站在总理背后，待总理看完，韩拿起文件离开。前两次约十几分钟。第三次，总理看了几分钟，抬起头对大家说：“我进去看点东西。这么晚了，你们也休息一下。”这时大概深夜两三点钟了，有的人不惯熬夜，就靠在椅子上睡起觉来。大约过了四五十分钟，吴庆彤对大家说：“总理一整天没有休息，上午九点还有一个外事活动。我有个建议：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紧急的事情，等一会儿总理出来，就不要主动提问了。好不好？请大家考虑。”总理出来后，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人吭声。总理说：“还谈吗？这么晚了。”仍旧没人说话。总理说：“哦，刚才讲到‘二流堂’，这个事情我要把它讲完。否则，我们这些老头子死了，没有人能讲得清楚了。当时延安演秧歌剧《兄妹开荒》，里头有个‘二流子’，吴祖光、黄苗子几个人，当时都在重庆，饱食终日，言不及义，被叫做‘二流子’。‘二流堂’的称呼是这样来的。这几个人后来都成右派了。这件事和郭老没有关系嘛，不要扯到郭老身上去。”（这几年陆续读到吴、黄诸人有关回忆文章，从中可知郭沫若为“二流堂”取名，此外并无更多关系。）“二流堂”当时成为一个要案，主要成员吴祖光、黄苗子等，当年在重庆同总理有来往。有人（主要是中央美院）搞“二流堂专案”，企图证实总理是这些“坏人”的“后台”。我们（音院“北京公社”）建立了一个调查“二流堂专案”的专案组，想方设法（包括深夜翻墙撬锁偷窃）搞到许多借此攻击总理的“黑材料”，陆续多次报送总理（照例同时送江青、陈伯达、康生。江青对我们不满，严厉点名批评“‘北京公社’受坏人操纵”，也许同这类材料有关？）。我至今记得一份黄苗子的亲笔“交代”，记述他们当年聊天闲扯的内容，字写得很漂亮，但是内容多半十分无聊，有些“荤故事”，即使现在看来也非常下流。之后，总理又问：“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大家仍旧不吭气，总理于是翻阅一份名单，主动提问。先问中央歌舞团（或东方歌舞团？）：“你们那里跑了几个人。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你再详细讲一讲。”那位同志讲了五六分钟，总理说：“你们现在一共关了多少人？”（那时开始“清队-深挖五一六”，许多人被隔离审查。）

好像回答“七十几个”。总理问：“材料比较确实的有多少？”又答了一个数，总理反应很快：“哦，少了一半。我还是不相信。怎么会有这么多呢？不可能的嘛。”其间不知怎样谈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六一六”（一个专门反周、公开提出“打倒最大的保皇派周恩来”的群众组织），总理说：“那天见‘六一六’，就在这里，有几个口才真不错！我希望‘六一六’出几个人才。”这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里所记，自信一个字都不会错。后来总理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提问，问得非常仔细。又说：“文艺界复杂，难管，没有人愿意管，就让我管。我哪里管得了呢？只好把你们送到部队去。这可能是个比较好的办法。……今天把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刘贤权，时任铁道兵司令、政委）也找来了。我说了些什么，以后他也可以证明一下子。把你们送下去，不是不管你们了，有什么事情，还是可以写信来嘛。”还有些话，记不准确了，大意是：下去以后，干农活，开头会腰酸背痛，要慢慢适应，不要一下子干得太猛，把身体搞坏了，不要晒得漆黑，以后回来，跳舞的还得跳舞，演戏的还得演戏啊……

约莫早晨七点了，总理说：“还谈吗？……天都亮了，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就到这里吧。”前后大约八个小时。

这件事竟已过去整整四十一年了！这么多年来，总理的声音，语调，表情，手势……他的热情，敏锐，细致，宽容，耐心……都清清楚楚留在我的记忆里，仿佛一切都发生在昨天。接连七八个小时，总理始终毫无倦容，应对敏捷。他两次进出会议厅，步伐很快，腰杆笔直，真所谓“步履矫健”。还有一个印象：几小时里，总理多次皱眉，但是始终没有笑，微笑都没有，一次也没有。

而今，反毛已成时尚。亦祸及周。诽谤污蔑，无所不至。泼皮瘪三扯淡骂街，倒也算了；竟有略具名声之所谓“学人”、“先辈”者流，亦争相唱和，唯恐落伍。罔顾历史，不讲道德，光怪陆离，叹观止矣……

李春光修改定稿。2011.12.25.

【大饥荒】

## 一九六零年（四）

——谁之过？

陆 凌

“正是人们创造天堂的努力，制造了人间地狱！”<sup>1</sup>

一群富有理想的社会精英，掌握空前强大的国家机器，出于富国强兵的美好愿望，进行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社会实验，最终上演了一出跨度三年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这就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发生在中国农村广袤大地上的真实故事。

对于这一段惨痛的历史，有着这么几种态度：责任人，当权者，或利益相关者，要么断然否认，要么百般掩饰，要么不愿面对；见证人，幸存者，受害人的后代，有的沉默不语，有的吞吞吐吐，有的不敢面对；研究者，旁观者，其他局外人，或极力辩护，或搅浑池水，或臆断谩骂。

金观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总序中写到，如果不能做到对历史场景的同情了解，不能在内心重演历史事件展开过程以及理会当时支配事件展开的普遍观念，就无法接近历史的真实。而且，仅仅停留在感性阶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某一种意识形态中走出来，尽可能价值中立地审视过去，达到反思的高度，以获得超越的视野。<sup>2</sup>

带着对于这段历史同情的了解，用超越的视野放眼回望，穿越历史，设身处地，回到六〇年那个寒冷的冬春，面对空锅冷灶，苦脸老少，饥肠辘辘的我，会相信政府或毛要刻意地饿死他的子民吗？我不相信。但我相信，用实证的研究，可以证明饥荒的存在，用理性的分析，能够说清饥荒的诱因。

<sup>1</sup>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第76页,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此句原作者是 Hölderlin, 原文为德文。

<sup>2</sup>林蕴晖, 《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 第xvi页, 香港中文大学, 2008。

毛不是虚怀若谷的君王，周恩来不是儒雅谦和的君子，但他们也不是嗜血茹毛的魔王。他们本欲成就千古流芳的共产主义伟业，不成想，却闯下弥天大祸。用百姓的话说，就是好心办了坏事。只是，这坏事做得太绝了，让毛超越秦始皇，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头号暴君。

“三年大饥荒”这场大祸究竟是怎么闯下的？众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清楚表明，是大跃进导致了大饥荒，林蕴晖先生有关那段历史的专著，就直截了当地定名为《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

## 一. 大跃进运动



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一个又一个新名词，一场接一场群众运动，在那个充满激情、富有理想的火红年代，在中国辽阔大地上，回荡着，冲击着，到处都是热火朝天、如火如荼的场景，万众一心，群情激昂，发愤图强，敢想敢干，似乎一切皆有可能。这就是大跃进运动的宏大历史背景。

大跃进是一场革命，力图用战争动员的手段推动经济的发展。大跃进从农业开始，浮夸是最显著的特征。大跃进决战于钢铁，全民动员，不计代价。大跃进持续升温，因为决策者误判农业形势。<sup>1</sup>大跃进是对苏联经济模式的抛弃，毛的战友们都真诚地相信，毛找到了一条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的新路。<sup>2</sup>毛是发动大跃进的战略家，也是指挥大跃进的总司令。

大跃进最荒唐的表演是农业高产卫星，最歇斯底里的冲锋是全民炼钢，最不切实际的空想盲动是人民公社，最异想天开的恶举是把亿万农民圈入公共食堂。

这一切正式发端于莫斯科，1957年11月18日，毛在克里姆林宫格奥尔基大厅宣称，

<sup>1</sup>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486、49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

<sup>2</sup>泰维斯和孙万国：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LF 1955-1959，第80页，M.E. Sharpe, Inc., 1999。

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就此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

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为大跃进下达“动员令”。5月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大跃进运动全面发动的标志，是动员大会，也是誓师大会。<sup>1</sup>8月在北戴河，通过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公开号召全党全民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神州大地，星火燎原，举国上下，陷入狂乱；五亿农民，沦为奴隶，生产生活，失去自由。人民公社=乌托邦，公共食堂弱化了家庭功能，毛的乌托邦开始成形。

11月在郑州，毛提出降温，五九年夏去庐山避暑，本欲继续降温，未料被彭张兜头泼了冷水，主席发怒，全党继续高烧。至此，中国就像一群陷入癫狂的病人，满脸通红，胡言乱语，踉踉跄跄地走向绝地。没有人能够停下来，没有人敢于停下来，更没有人敢于站出来、阻止别人向前走。反“右倾”再跃进，发起最后的冲锋，到了六〇年夏，面对尸横遍野，毛沉默寡言，精神恍惚，退居幕后。<sup>2</sup>毛终于意识到经济发展不是百米赛，而是马拉松。<sup>3</sup>1960年11月，大跃进戛然而止。

这就是历时约三年的大跃进，从1958-1960年，导致了从1959-1961“三年大饥荒”。

为什么说大跃进导致了大饥荒？先看毛为何发动大跃进，再扼要分析一下大跃进对于工农业生产及国民经济的影响。

## 二．毛为何要发动大跃进？

1945年后，毛顺风顺水，几年内，就在中国历史上打下自己的烙印。战争中，他打败了蒋介石；和平时期，他超越了斯大林。革命的胜利者转变成国家重建的设计师，进而倡导新的社会结构。<sup>4</sup>1958年是毛一生中政治生涯的最高点，达到权力的最高峰，是他最辉煌灿

<sup>1</sup>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第64页，香港中文大学，2008。

<sup>2</sup>冯克：Mao's Great Famine-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第107页，Walker & Company, New York, 2011。

<sup>3</sup>麦克法夸尔：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3, 第468页，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sup>4</sup>麦克法夸尔：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3, 第466页，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烂、最踌躇满志的时刻。<sup>1</sup>由此以后，就不可逆转地进入拐点，一步错，步步错，错失良机，死不认错，错上加错，终铸大错，一代英豪竟沦为民族罪人。斯时的中共及中国，一言以蔽之，成败皆因毛！

城乡集体化完成后，毛展望未来，把集体主义的胜利，当成他下一个任务的跳板：从经济上改造中国。集体化为毛的大跃进打下了经济和组织的基础。百花运动的失败，反右运动的成功，使中国政治火车在经历短暂的左右摇摆后，毅然决然地向左驶去，这是大跃进的政治基础。

从百花运动到发动反右，到喝止反冒进，再到大跃进，我们看到，毛曾企图对政治进行改良，借助党外的社会精英整顿党风，但是毛的改良尝试党内遭遇抵制，党外受到挑战，毛进退失据，恼羞成怒。政治改良流产，毛回归党内，重惩不自量力毁谤中共的“民主党派”并便利地把经济上的反冒进与右派们的反党行为联系起来，使党内主张遵循苏联模式的经济官僚噤声。



有人说，毛搞大跃进的目的，是为了替代赫鲁晓夫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这种功利的看法掩盖了一个事实，毛奉行的激进的经济政策，根植于他对于共产主义发展理论的理解。<sup>2</sup>为了把中国从苏联模式中解放出来，毛发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以乌托邦式的努力，力图创造出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党外精英不能依靠，农民变成发展的动力。农民被认为是一穷二白，要被改造成新人，既能务农、做工，又能从商、教学，如果需要，还可以搞军事。但是，毛的宏大设计，一场集体主义的盛宴，在大跃进诱发的全国性大饥荒前崩溃了。<sup>3</sup>

大跃进这场喧闹的盛宴，是如何因毛皇帝的新衣，弄得一片狼藉？

<sup>1</sup>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上册，第173页，台北联经，2012.1。

<sup>2</sup>Lü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第112页，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sup>3</sup>麦克法夸尔：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3, 第467页，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 三. 高产卫星——毛皇帝的新衣

农业集体化是大跃进的经济基础，这个十分薄弱的基础，因为高产卫星的频放，被愚妄而神奇地瞬间夸大与强化了，这是产生大饥荒的根源。至今没有弄清楚，究竟是高层居心叵测地玩弄了农民，还是农民自以为是地糊弄了高官？是政治绑架了科学，还是科学捉弄了政治？毛出身农民，他真的相信那些高产鬼话？钱学森，一流的科学家，真的心甘情愿地为政治叫床、一再编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这类伪科学谎话？<sup>1</sup>

翻开有关这一段历史的书籍报刊，我无法不摇头，难以置信，太荒诞了，荒诞的程度，远超安徒生笔下皇帝的新衣。两个骗子编织的那件新衣，除了愚弄皇帝及大臣们以外，对观看游行的臣民并无任何损害。毛皇帝的高产卫星-这件由无数官员与广大农民、媒体记者合力编织的新衣，不仅“愚弄”了毛，还残害了数千万农民，高估产导致高征购，夺走的

就是农民碗中的口粮。

从6月起，《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就轮番密集放卫星，粮食产量扶摇直上云霄。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的广西环江“中稻亩产”高达令人瞠目的13万斤。

薄一波说，没有一位省级以上的干部对任何一颗“卫星”的真实性作过认真的调查。<sup>2</sup>陈毅元帅1958年9月26日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亲眼看见番禺县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的事实。<sup>3</sup>又如何解释？



反右之前的鸣放是“阳谋”，（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放高产卫星）

高产卫星会不会是阴谋，目的是夺农民的口粮以发展工业？口说无凭，暂且存疑。

大跃进从农业开始，高歌猛进，自说自话地“解决”了农业问题，1958年底，八届

<sup>1</sup>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935,946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6，第七版。

<sup>2</sup>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1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

<sup>3</sup>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935-6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6，第七版。



六中全会公布粮食年产 7500 亿斤，实为 4000 亿斤，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对于农业形势的严重误判，造成重大决策失误，终酿大祸。

高产卫星之后，就是全民炼钢，公共食堂，粮食消耗巨大。历史如此演变，自有其内在逻辑。

#### 四. 大炼钢铁——毛为钢而狂

“钢是社会主义魔力神圣的组成部分，钢产量是一个魔幻数字，被社会主义国家带着宗教般的狂热，广为传颂。…毛为钢而狂，对他来说，超英就是超过英国钢的年产量。”<sup>1</sup>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对于钢铁的渴望与迷恋，就像今天看航空母舰。钢铁是工业化的象征，是壮大国防的前提条件，航空母舰是中国梦的图腾，是外强中干最好的道具。

大跃进留在民族集体记忆中最鲜明的映像，就是火红而热烈的大炼钢铁场景。

图片 4-5（上右）：木版套色 “丰收”<sup>2</sup>



全民炼钢是五八年大跃进中歇斯底里也是代价高昂的一场经济狂飙。1070 万

<sup>1</sup>冯克, : Mao's Great Famine-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第 57 页, Walker & Company, New York, 2011。

<sup>2</sup>杜斌编: 《毛泽东的人肉政权》, 第 176 页, 明镜出版社, 2013.2。



吨钢产指标是如何出笼的？概述如下：

- 1957年中国的钢产量为535万吨；
- 1958年2月，人大会上批准的年度指标为624万吨；
- 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提高到700万吨；
-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及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变成800-850万吨；
- 1958年6月17日，薄一波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900万吨；
- 1958年6月18日，薄的数字变成了1000万吨；
- 1958年6月19日，毛问王鹤寿，去年是530，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

由此， $535 \times 2 = 1070$ 万吨的指标得以诞生<sup>1</sup>

二月份六百万，三月份七百万，五月份八百万；六月十七日九百万，六月十八日一千万，六月十九日翻一番；先是一月或两月涨100万吨，到了六月份，三天涨了300万吨！

到了7月底，累计产钢380万吨，还差约700万吨，怎么办？宋庆龄来帮忙，她家的院子里搭起了炼铁炉。<sup>2</sup>不可思议？当时，就是这么干的。9月，开始“全民夺钢保钢”运动，高大上的“大、洋、群”（大中型企业群众炼钢运动的简称）无法完成指标，采用土法炼钢、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小、土、群”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最多时投入农村劳动力6000万人，<sup>3</sup>全国有9000万人参与大炼钢铁。<sup>4</sup>

（下图：“小土群”、“炼钢又炼人”）

<sup>1</sup> 泰维斯和孙万国：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LF 1955-1959, 第102-3页, M.E. Sharpe, Inc., 1999。P102-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490-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

<sup>2</sup> 于幼军：《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第366页，广东教育出版社，2011.4。

<sup>3</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49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

<sup>4</sup>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116页，人民出版社，2009.5。



12月22日,《人民日报》慷慨激昂地宣告,指标完成了,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狂想加蛮干。

写到这里,掩卷沉思,这个国家怎么了,几亿人同时失去理智、陷入愚妄和癫狂?尽管现在看来这一切是可以理解、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最终,对于后人来说,大跃进期间的高层政治是令人沮丧的。我们现在看到,一批政治领导人,包括精明聪慧的陈云、令人尊敬的彭德怀、张闻天,接受了完全不可信的、未经检验的方法及发展计划,当中国在缓慢地滑入灾难的深渊时,没有人挺身而出,大喝一声‘够了,胡闹该停止了’,甚至在庐山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发生。忠诚、恐惧、根本无法想象有时毛也会犯错,这一切,把年轻的共和国带入她的第一场大悲剧。<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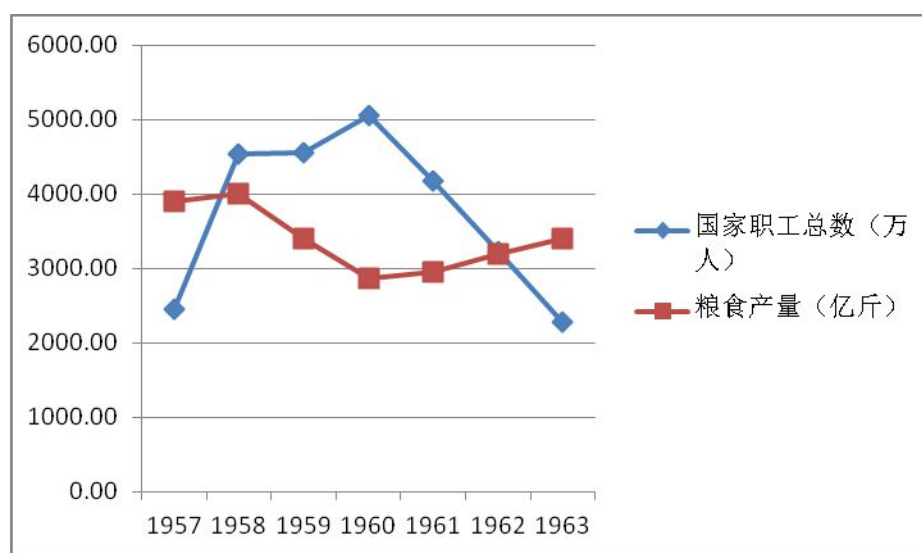
## 五.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高产卫星、大炼钢铁,紧随其后就是大饥荒的发生。历史事件的内在关系依然必须分析清楚,否则,不可以断言大跃进导致了大饥荒。

<sup>1</sup> 泰维斯和孙万国: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LF 1955-1959, 第200-201页, M.E. Sharpe, Inc., 1999。

薄一波说，大跃进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大灾难，<sup>1</sup>它带来很多大问题，如资源的大破坏与大浪费、经济大失衡和对农民的大掠夺。钱理群认为，历史的发展是这样一个过程：从高速度的愿望出发，导致高目标，再导致高指标，又导致高估产，然后导致高征购，实际上就是剥夺农民的口粮，最后导致农民大批死亡。<sup>2</sup>本书第一章中提到，1958年冬就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春天饿死人更多，就是五八年大跃进的直接后果。

下面，我们通过线条图来比较分析一下1957-63年国家职工总数（非农业）<sup>3</sup>及全国粮食产量的变动，看看粮食的供需变化：



（1957-63年国家职工总数（非农业）及全国粮食产量的变动）

1958年，国家职工总数由上一年的2451万人，猛增到4532万，1959年与上年持平，1960年由于再跃进，职工总数再增，达到那一时期的顶点5100万人，比1957年翻了一番还多。而1960年粮食产量比1958年下降了近三成，同期粮食进口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如此折腾，怎么会不缺粮？

大跃进期间，1958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第一个紧急指示，与大炼钢铁无关，居然是要求突击收购和调运农产品。与此相关，1958-59粮食年度共征购1123亿斤，

<sup>1</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0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

<sup>2</sup>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上册，第280页，台北联经，2012.1。

<sup>3</sup>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88、116、133、174、281、282、311-12、315-17、338页，人民出版社，2009.5。

比正常年度多 200 亿斤；有些地方，如山东馆陶 1958 年冬便有公共食堂停火、社员逃荒，早在 1959 年 2 月，就有浮肿和饿死人现象。<sup>1</sup>如此胡来，就会饿死人啊！

大跃进的疯狂之旅、灾难之路走了三年，篇幅所限，这里不再介绍 1959-60 年的跃进情况。结论是相同的，没有五九年的“反右倾”和其后的再跃进，饥荒就不会延续。没有大跃进，就没有大饥荒。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是一个历史命题的展开过程，是毛“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的必然结果。其开端是理想主义的，却内含三大问题：第一，空想社会主义的设想本身就脱离实际，看上去美丽，贸然推行，就会出大问题；第二，它又内含一个富国强兵的现代化逻辑，是以牺牲农民为前提和基础，高征购将农民逼到饥饿死亡的绝境；第三，人民公社体制，极大地强化了一党专政，以专政或准专政的手段对付农民，从一切领域所有方面，对农民实行全面的控制，最后堵绝农民一切自救之路。<sup>2</sup>

大跃进期间，为何要搞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对大饥荒有怎样的影响？

## 六. 人民公社是乌托邦

前文提到 1960 年夏，湖南运煤工刘桂阳在中南海西门外，张贴标语攻击人民公社。当时，人民公社不到两岁，已失去民心。大跃进使公社早产，但公社没有因大跃进的流产而死亡，共产党人不得不继续在规模收缩的公社框架内挣扎，而农民们被束缚其中苟延残喘。

人民公社的产生既是农村集体化浪潮的惯性延伸，也是毛急于求成期盼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空想盲动。从功能性看，大跃进使人民公社应运而生，快速工业化的战略，需要补充大批产业军，公社是把农村劳动力及其它农业资源转变为工业资本的最快捷、最有效也是成本最低的手段。

毛认为，从前乌托邦的空想，需要实现。人民公社就是利用行政权力建立起来的、带

<sup>1</sup>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 117 页，人民出版社，2009.5。

<sup>2</sup>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上册，第 286 页，台北联经，2012.1。

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军事共产主义色彩和超社会发展阶段的空想色彩的联合体。<sup>1</sup>胡乔木说，人民公社就是毛想像中的农村乌托邦。<sup>2</sup>

“一大二公”是人民公社最鲜明的特点，反映出公社服务于国家工业化蓝图的本质。

“大”使小农的汪洋大海干涸，公社化的农民，失去人身自由，可随时调动任意征用。李井泉曾说，五八年公社成立，男劳力大批外调，妇女把缺乏男劳力的公社讥称为“人民母社”。<sup>3</sup>“公”则使农民失去生产资料，“共产风”几度狂飙，卷走农民微薄的家产，抹平农村贫富差距，国家趁机剥夺农民，积累乡镇工业的资本。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对赵紫阳说，自从有了人民公社，（农民）就没有吃饱饭。<sup>4</sup>

（下左）：李井泉，曾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对大饥荒期间四川几百万人口非正常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上右）：赵紫阳，曾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当时民间有“要吃粮，找紫阳”的说法；

<sup>1</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43、53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

<sup>2</sup> 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第168页，香港中文大学，2008。

<sup>3</sup> 丁抒：《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第143-4页，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7年7月修订本。

<sup>4</sup> 丁抒：《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第99-100页，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7年7月修订本。

也曾任广东省委书记，是“反瞒产私分”的始作俑者。赵在四川任职时，最早开始解散公社。<sup>1</sup>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国家对于农民的掌控超过历朝历代。1959年初，自广东开始的“反瞒产私分”运动，是利用国家机器对农民血腥掠夺最典型的事例，干部把大量的农民折磨致死，以逼迫他们交出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的粮食。饥荒爆发以后，政府为了政治目的，使用民兵，强力阻止农民外出逃荒、进入城市，农民无法自救，只能坐以待毙。光山农民吴永宽说，那时候的城镇户口，就像一张免死牌。<sup>2</sup>如此蓄意而无意义的残忍难以理喻，农民毕竟不是被异族征服掳掠的奴隶。毛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就是用极度野蛮的方式，来实现空想的文明。<sup>3</sup>

有的学者说人民公社是大饥荒的组织基础，这种说法空泛模糊。虽然对农民政治上的歧视与经济上的压榨相伴相生，三年大饥荒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是愚妄而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的，人民公社与大饥荒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大伤了农村的元气，对饥荒的发生有一定影响，但中国1962年就慢慢地走出了饥荒，人民公社继续存在，直至八十年代初期，才悄然退出历史舞台。大跃进后的人民公社后退很多，可能有其名无其实。无论如何，人民公社与三年大饥荒的相关程度，尚需更翔实的研究予以核定。

相较而言，公共食堂与大饥荒的关系就直接的多。公共食堂不仅催生了大饥荒，而且随着公共食堂在1961年五六月间的一哄而散，农民得到“第二次解放”，<sup>4</sup>此举缓解了饥荒，农民开始步履蹒跚地从饥荒的魔爪中一步一步地挣脱出来。

## 七. 公共食堂是大饥荒的催生剂

<sup>1</sup> 贝克：Hungry Ghosts-Mao's Secret Famine,第344页，Henry Holt & Company, LLC, New York, 1996。

<sup>2</sup> 《人物周刊》总第299期，第38页。

<sup>3</sup>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上册，第286页，台北联经，2012.1。

<sup>4</sup> 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第669页，香港中文大学，2008。

公共食堂是大跃进狂潮中最异想天开的“新生事物”。它制造了毛的乌托邦中虚幻而短暂的富足场景，九梓上陈的华叔说，起初大食堂一天四顿饭；它也是无数农民伤心断肠



之地，好景不长，放开肚皮一下就把农村吃垮了。

几亿农民，圈入食堂，妇女趁机摆脱了锅灶的约束，变成公社的劳力。乡村干部手中的权力，借助食堂对社员嘴巴与肚皮的控制，被无限放大。公共食堂，一举数得，多么美好又是多么理想。

（左图：农民在公共食堂就餐的场景。四亿农民不再或不能做饭，依靠食堂，亘古未有之奇观）

然而，历史的事实是，公共食堂是大跃进时期农民最深恶痛绝的政策举措，被认为是“捆绑农民的一根绳索”。<sup>1</sup>公共食堂剥夺了农民的生活资料，使家庭这个最原始的社会单元，在饥荒袭来时，丧失了自救的基本手段。这种乌托邦的社会形式与当时的道德水准脱节，在粮食比较充足时，到处都是毫无意义、令人痛心的浪费；在粮食匮乏时，则产生了无法控制的中饱私囊、腐败与不均。顾准问到，一把卡住农村人口吃饭问题的公共食堂，怎能不成为横行霸道的权力的来源，与道德败坏的泥坑？<sup>2</sup>

与人民公社类似，公共食堂发端于毛刘的共产主义狂想之中。1958年夏秋，公共食堂一哄而起，10月底，全国已有二百多万个，<sup>3</sup>1959年春，大批食堂散伙，庐山会议上，毛力挺公共食堂，强令恢复，年底共有4亿农民在三百多万个公共食堂吃饭，1960年，粮食形势愈加严峻，中共屡屡发文巩固食堂，欲为无米之炊，1961年4月，毛刘分别解散韶山和长沙天华的公共食堂，5-6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终于松口，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几百万个食堂，一夜之间几乎一哄而散。<sup>4</sup>

食堂兴办初期，浪费严重，据时任国家统计局长的薛暮桥估算，农民吃食堂浪费的粮

<sup>1</sup>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第690页，香港中文大学，2008。

<sup>2</sup>顾准：《顾准日记》，第117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sup>3</sup>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

<sup>4</sup>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732-762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6，第七版。

食约有 1750 万吨，相当于 1958 年农村供应粮食的 11%。<sup>1</sup>农民以为粮食吃完国家会管，国家根本不管，1958 年底，不少地方公共食堂就停伙了，饥荒突然降临。公共食堂使饥荒提早发生、加剧了饥荒的严重程度。杨继绳认为，在大饥荒期间，如果没有公共食堂，有些地方饿死的农民可能要减少一半，从全国来看，没有公共食堂，饿死的人可能减少三分之一。<sup>2</sup>这种说法，缺乏实证，比较武断。值得指出的是，公共食堂解散的越晚的地方，如四川，肿病和非正常死人的情况就越严重。<sup>3</sup>大饥荒与公共食堂如影随形，足见公共食堂的严重危害性。

吹去历史的尘埃，拨开宣传的谬误，我们看清了农民们是如何在毛的引导下，一步步从大跃进走向大饥荒的死亡之路的。大跃进无疑是毛发动的，1958 年初南宁会议后，毛直接主导经济决策。从南宁到北戴河，从大跃进到反右倾到再跃进，毛强势主导独断专行，无人可敌。当时，刘周朱陈等唯诺顺从为虎作伥，令人慨叹；省级负责人见风使舵欺上瞒下，令人发指。在原教旨马列理论指导下，在高歌猛进的共产国际大潮中，在蕴含深厚专制独裁传统的中国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规模宏大、跌宕起伏荒诞无稽、哀婉凄楚惨绝人寰的大悲剧，终于上演了！曲终人散大幕落下已五十余年，是非曲直依然无法公开论述，着实令人扼腕长叹悲愤难平。

麦克法夸尔清楚无疑地宣称：“没有毛就没有大跃进，没有毛就没有人民公社，没有毛就没有大炼钢铁，没有毛就没有再跃进”<sup>4</sup>。由此，我们可以推论，没有毛就没有大饥荒！

大饥荒，毛之过！■

<sup>1</sup>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上册，第 270 页，台北联经，2012.1。

<sup>2</sup>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 755 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6，第七版。

<sup>3</sup>《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 1 卷，第 62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04。

<sup>4</sup>麦克法夸尔：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第 2 卷，第 333 页，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述 往】

## 一个知青上山下乡的艰难历程（一）

王复强

### 前 言

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14岁半，在北京西城区华嘉寺中学上初二。我在家里排行老八，那阵儿我二哥管我叫“小屁孩儿”。文革了，不上课了，我打心眼里高兴。但好景不长，折腾了三年后，1969年9月23日，我刚过18岁，响应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被送到祖国最北端的黑龙江嫩江的山河农场下乡务农。开始了我人生中一段艰难的历程。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发表领袖关于把知青“送到乡下去，来个动员”的最高指示时，《人民日报》有个套红的通栏大横标“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那时，学没得上，工厂不招工，城里几百万知青几百万张嘴要吃饭。《人民日报》那意思，是不是说城里没活干？让我们到农村去种地，自己个儿解决吃饭问题？

从1967年至1976年，全国城市有2000多万知青，包括66届、67届、68届三届高中、初中共六届学生（人称“老三届”）上山下乡，只有极少数幸运儿进了工厂，更有极少数的高干子弟“走后门”参了军。2000万人，这是什么概念？顶得上当时4个瑞士或1个澳大利亚的全国人口，这是人类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向农村的人口大迁移。2000万名知青上山下乡，影响了2000万个青年的生活、学业和前途，牵扯了4000万个父母的心，影响了上亿人的正常生活。上山下乡对文革后期人心的转向，对文革的失败，影响极大。到毛泽东去世后的1978年，出现了知青回城大潮，99%的知青返回了城里，回了家。他们用双脚否定了毛泽东上山下乡政策，否定了毛泽东用政权的力量去缩小城乡差别、脑体差别、工农

差别的实验，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做为当年知青的一员，我想用事实，用当时真实的经历、感情、和“活思想”来说明以上的观点。

## 离京下乡

“哐啷”车晃了一下启动了，“哇”的一声炸响，近万人（近两千知青、数千送行人）从内心深处同时嘶喊，瞬间迸发的哭喊声，震撼着公元1969年9月23日上午8点半的北京站。妈说上班前来送我，但她在人山人海没找着我，我挤不近窗口，那早已堆满了人，车窗外挤满握手叮嘱的人，无奈绕到已关上的车门口，我贴在玻璃门上看到了妈妈正焦急地仰望车窗，在人群中找我，我拍门喊叫她根本听不到。在哭喊、轰鸣声中列车缓缓移动，妈跟着列车走，她知道我的车厢号；离开家分手时大姐送我到政协礼堂，在那儿知青集中上了几辆大卡车去火车站，妈妈是骑车去火车站送我的。站台上她喊着我的名字，跑着，仰头四处找着，但她没能看到自己要送别的儿子，车速加快了，失望而焦急的她追不上了，风吹散妈妈的头发，我趴在车门上看着向后移去的妈妈，人群、车站、北京、她的身影渐行渐远。许久，我将脸贴在车门玻璃上，一个念头纠结着：我还能回来吗？

火车往北开了两天半，村庄城镇越来越少，土地越来越荒芜，天气越来越寒冷。我是独自上路的，一个同学都没有，68年因患甲肝炎，我没去插队，走了一批同学，69年初兵团不收右派出身的我，又走了一批同学，最后这个原劳改农场来招人，同学中就剩我一人去了这山河农场。车厢里碰上个幼儿园同学，算半个熟人。天黑了，我探出车窗，冷风拂面，看着夜幕下转弯的车龙，北去的列车将我们的生命拖向遥远的未知。

最后，火车在齐齐哈尔停下。知青们扛着自己的行李 换上窄轨小火车继续北行一天，窗外全是荒草甸子，终于到达嫩江车站。再往北就没铁轨了，我们开到了中国铁路尽头。在这边陲小镇大家换乘大卡车，一千多同车来的知青分别上了不同的卡车，被拉去各农场。

九月底的北大荒下着阴冷的秋雨，卡车沿黑嫩公路往北开了三个小时，山河农场三分场到了。

我们跳下车，各自扛着行李卷，踩着半尺深的泥泞，被领进一个像仓库似的长条房子。房子约有三十米长，里头两边各一溜土炕。这就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新家，此行的终点。但不是我命运的终点，从到的第一分钟我就下了这个决心。

这个宿舍原是给劳改农场犯人住的。分配给我们每人九十公分宽的空间，双边炕上靠墙各一排半米高的木架子，架子上每人有相应空间放箱子。我们之后，又来了上海知青，哈尔滨、鸡西知青，一共住了七十多个男知青。房子中间有盏25瓦的灯泡。有个鸡西知青有天天尿炕的毛病，大伙让他睡炕顶头，旁边空出近两米空间。晚上起夜，厕所离宿舍有两百米远，冬天零下四十几度，没法跑那么远，大家都在一出宿舍门就近解决，一冬下来门口冻出个一米多高的尿山。

宿舍里跳蚤老鼠横行，第二年秋爆发了可怕的出血热病，患者先无尿发高烧，后多尿出血，全身皮下红血斑、流鼻血尿血，二周时间即死亡。我们分场死了三个知青，其中一个是北京来的一对双胞胎的妹妹，那晚我们听女生宿舍哭了一通宵。农场遂被封闭，禁止出入。宿舍所有的被褥搬出去晒，运来整车的白灰洒在炕上地下炕洞里，灭鼠灭跳蚤。后来，在京查阅中华医学杂志才知是鼠疫，在满州国日本关东军中曾爆发过，是老鼠患的疾病，再由叮过带病老鼠的跳蚤传播给人。一时恐怖气氛弥漫、人人自危，直到严冬来临才解禁。

两排大炕一边六个、共有十二个炕洞，傍晚卸两车柴草供烧炕，豆秸麦秆啥都有，下工晚了的抢不到柴的就睡凉炕。冬天室外零下四十多度，使用这类低热能燃料几个小时后，炕就冰凉了；宿舍内温度每天早晨都是零下二十几度。俗话虽说“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但那时落下的腰背病伴随了我一生。

为阅读做油灯，小药瓶灌上油，瓶盖钻个眼穿个鞋带当灯芯就能用，看一会儿脸就熏黑了，后来我找来个马灯，觉得好用的很。长期油灯下读书，下乡三年半变为近视。但发

自对生命的珍惜，每天几小时阅读从不敢半点怠慢。阅读使我跨越环境，超脱自我，神游古今中外。前途未知但希望不灭，坚信无论将来干啥都应储备做人的基础知识：世界历史，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哲学，经济书，美学，通读毛选，马列经典，读书涉猎文史哲经。下乡三年半生吞活剥，啃了一批大部头，做了大量笔记，从未间断思考、讨论，北大荒的磨砺与阅读是我的大学。每年探亲回来背的最多的书籍，从不带小说因那不经啃。在现实与知识的启迪下，我开始了反思文革，思考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比较人类不同的文明与制度，研究普世价值观，学会独立思考。那十年荒芜废了一代人，却也磨难造就精英，那一代知青中已有一部份人在磨难与阅读中，开始蜕变与渐悟。

老马与我又坐在南崖岗上，望着一览无垠的黑土地，我俩又开始每周一次的讨论，这个命题已谈了几个月，中国三千多年的文字文化积淀，为什么没能孕育出现代科学文明？中国文字文章太难无法做大众知识工具，中国科举制囊括知识精英从仕，中国地理封闭东海西山北漠南荒不利与欧、亚文化流通，中国黄泛难治需集权力量抗衡压制思想多元化，中国农耕文明儒教重人伦轻物质，如此等等，在每天劳作之余，学习与思考是另一重要的生态。老马也爱看书，是少数能交流的朋友。

幼儿园同学云祥会摔跤，据丫自吹师承天桥把式张三，他从京带回一对摔跤褡裢，没袖子大腰带厚帆布，光膀子穿上，两人对阵开练。云祥教大伙，我们吃完晚饭一帮男知青天天跑砖场的脱坯场子练跤。蹭，披，大背胯，得合乐，一大堆招术。

那几年修理地球，看书，玩闹，但一直不认为是我安身立命的久留之地，从来没有扎根边疆一辈子的想法，这地方我不能呆一辈子，这决不是我的生命，我必须离开这里，去寻找自己人生舞台。

## “盲流”

早春三月，风雪冷峭，车过嫩江，探眼望去冰封江面上车如长龙，过江就是呼伦贝尔了。离开双城兵团军马场的北京同学点后，下一个“盲流”地选中了莫力达瓦旗的北京知青插队点。兵团这帮丫的太滋润了，住的吃的比我所在的原老改农场强太多了。我跟他们一块报名去兵团被拒，右派狗崽子人家兵团不收，之后这原劳改农场来招人要了我。我到农场后常出去游荡，这次出来“盲流”，又半个多月了。十七八岁，破衣烂衫，囊中空涩，漫无目标，啥都不吝，包里塞本黑格尔小逻辑和俩窝头，现回想起来也搞不清当年到处“盲流”的我有啥动机，是啥心态。当时有句话：远瞅要饭的，近看是知青。

过江下了长途车，边走边打听，走出十几里找到了北京保姆孩子插队的莫力达瓦旗所在那个村，她已与当地人结婚，图个能吃饱不干重活，对我爱搭不理，带我去她已离开的知青点，那帮人对她也并不亲热，见我这么个来吃饭的生人，也没啥老乡见老乡的热情，我臊不搭眼蹭了顿饭，大炕上挤了一晚。在京时妈叫保姆女儿到家来，给我介绍过，说这儿比农场强，吃的饱，我也就是过来瞅一眼，要是真好再说，到这一看就算了。回想在双城兵团军马场北京同学的热情接待，他乡重逢老同学的喜悦，另有一番味道。

两天后赶回嫩江西岸边我傻眼了，来时的万里冰封、汽车轰鸣的江面已变成澎湃江水卷着大块冰排、千军万马奔腾而下！旁边一老乡告我：嫩江开封了。这可惊了我一身汗，回不去了，身上没几毛钱，往下游一千多里路，到齐齐哈尔才有过江大桥。长途车票，我根本没钱买！扒火车虽不买票，可嫩江西岸没火车。望江兴叹，进退维谷。转悠到长途站候车室跟老乡们挤一宿，一早就跑到货车停车场去打听哪辆车去齐齐哈尔，司机们南来北往去哪儿的都有。后来发现一辆大解放后斗里坐着几个背行李老乡，过去以极谦卑和蔼的口气，向一位慈眉善目的大嫂探明这车是去齐齐哈尔的，但要给司机钱。我二话不说，爬上去坐在旮旯里。

半晌一特奘的汉子上来，扫视一眼各位顺风客，最后盯着我：嘿！你下去，叫你哪！眼毒的很，一眼就看透我没钱。我先以感天地动鬼神的诚恳语调讲：叔叔求你拉我去齐齐哈尔，我必须过江回农场去抓革命促生产。没用，丫开始拉我下去，力量远大于我。见他动粗，我速用双臂抱紧车帮子木栅，两手紧握，任他怎么发力拽，我死不松手，车上老乡们沉默地观看这一幕。五分钟后这位司机看出这小子是豁出去了，他骂骂咧咧地下去了，车终于开了。

几小时后，有人挪我旁边，小声问：嘿，哥们你哪区的。这位一听就是北京知青，我轻声讲，西城西四的。我也西城，他答到。真是他乡遇故知，心头一热，我们盘起道来，哪个学校，哪条胡同，窃窃私语，汽车飞驰，转眼天已全黑，车入齐齐哈尔郊区。

夜幕下宽阔的街道，一排排路灯，高耸的楼群，这些城市印象已在记忆中褪色，那一瞬间纳入眼帘的久违场景让我宛若隔世，世上竟有如此漂亮的去处！齐市郊区给我的视觉冲击决不亚于多年后初见梵蒂冈圣保罗大教堂高耸的弧顶。早已看惯白山黑土，早已忘记都市的一切，好像生来就是山民，而那时我离开北京才不到一年。车过嫩江大桥停了，搭车的都在这下了车，历时几天我又回到江东岸，夜幕下庆幸终于过江之余，突感腹中饥肠辘辘，已是二十几小时没进食了。一块下车的北京大哥拍了一下肩头，指了下几十步外灯光阑珊处一家小饭馆说：走，吃饭去。黄灯光下他拿着油腻的菜单点了个过油肉，还有一个烧土豆。几十年过去，那菜单、那肉香我终生不忘。我强控着欲望尽量表现得绅士点儿，但那的确太难了。这位大哥告我是去阿荣旗插队的，回京探亲，他话不多但给我印象是特可靠。临了，我脱了一件离京前我妈给我的澳毛毛衣，托他带回去给我妈，因我感到这毛衣太高级舍不得穿怕毁了，那上面太容易长蚤子，而我全身都是这种小动物。而后很不好意思地看着他结了账，这位大哥与我一块在夜幕下走到齐齐哈尔火车站握别，各奔南北，我爬火车往北七个小时回到嫩江县城，再坐大巴两小时到黑嫩公路49公里处(我们的地名)，下车再走十几里，晃晃荡荡回到三分场，又恢复了我日复一日的修理地球工作。一个月后妈妈信中告我，一位同学从北大荒捎回件毛衣……

## 馒头

一个平常的冬天周末，摄氏零下40度不用出工，凌晨我跟云祥就上路了。他绰号“西四猴”也算是北京四九城有点小“份儿”的顽主，大通铺睡我旁边。他是我幼儿园同学，算是半拉熟人。半年了没粘着白面，想这口了，听说四分场有白面馒头，为那白馒头，我俩踏上征程。那儿有七机部的哥们儿黑小保，今儿去奔他去碰碰大运。四分场没去过，大方向知道，向北三十多里翻三个山头就到了。腊月大兴安岭白雪皑皑，树林寂静，枯叶斑斓，阳光映在漫山遍野的白雪上晃眼。与列宾笔下俄罗斯冬日乡村色调一样。在白桦树、柞树的林间小路上，我俩一前一后默默行进，为省劲都不说话。两人轮流在前面踏着没人碰过深没膝盖的雪，后边的比照前边踏出的一个个雪洞行进。中午我俩赶着饭点到了四分场，找着黑小保，他够仗义，给我俩各打了两馒头外加各一份白菜土豆，下两顿他得饿着了。我俩瞬间扫荡一空，连面粉味还没品明白，就已经结束战斗了，两馒头对饿狼似的我连塞牙缝都不够。其实干掉几十个馒头也是小菜一碟，上次回京探亲，晚饭妈蒸了两屉馒头，二两一个共十六个，她去炒菜十来分钟回来一看馒头全没了，她惊讶地看着我，楞有点不信地问我：好家伙，都你吃了？！她只好又蒸了二屉。我与云祥吃完，抹了把嘴起身往回返，晚了会遇上山里群狼就麻烦大了。

走了十里地，肚里那点午餐已耗空，呼吸开始粗重而短促，单调地重复。走了约一大半路程身后飘来云祥惊悚微抖的喃喃声：我的手表哪？随之是他如炸雷般的大吼：手表怎么没了！惊的我俩都傻了，这事可大了！云祥那块瑞士百浪多（现在知道没啥名气）是全部百十来号北京知青唯一的一块进口表（丫从哪儿顺的不得而知），受到全体京沪数百知青的羡慕。从短暂的惊愕中回过神来，我俩沉默地同时返身沿来路跑回去，约几里路后，夕阳西下，逆光之中，白雪之上一道耀眼的反射光远远地直晃眼！我俩踉踉跄跄地在雪中狂奔过去，拾起这块表带坏了的宝贝。

接近我们的知青点了，夜幕降临之际整个山林、乡村、雪地都是淡蓝色的，远远望着窗口灯光、房顶青烟，饥肠辘辘之中明白今个儿晚饭肯定是赶不上了。这就是我在北大荒平淡却难忘的一天。

多年后看索尔仁尼瑟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他在西伯利亚劳改营中，从饭盒里仔细地寻找小肉渣那情景，我会意一笑。

### 担水劈柴

第二年调我去水房，虽累但自由，我愿意。这活原是两人干，农忙时上头要求改为一个人，别人不干我就接了下来。水房供一百三十人饮用开水及早晚两次洗脸洗澡用水。水房里三口大锅，每个二十桶水可灌满。

每天早上分过洗脸水大伙出工后，宿舍就剩我，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炕席上，一扫喧闹安静极了，毫无干扰看两小时书真舒坦。十点钟我得挑水去了，井台距水房约三百米，井深四十米，上了井台轱辘飞转，手抖井绳桶翻下沉，“咕噜”一声汲满水，马上转轱辘提桶，稍慢桶会脱钩掉入水里，那很麻烦。两桶装满上肩稍微一颠找准重心，上身前倾，人就飞步窜出去，感受着扁担张力传给身体的节奏感。双桶下压的瞬间正好脚根落地，双桶上弹之际正好迈腿向前，脚下踩着点，上身稳如山，扁担悠悠，步履嗖嗖，讲究的是滴水不外溅。到了水房后桶下压，前桶上抬，桶底往大锅沿一靠，往前推桶，水倒入大锅，而后一旋，另个桶上灶台如法炮制。上午这30趟60桶水，每趟来回约300米，共走9000米，要二个多小时干完，之后要烧开三口大锅饮用开水。

这儿的水不烧开不能喝，当地人都有大骨结病，水从井里刚打上来时阳光下满满是闪闪发光的矿物质微粒，烧开沉淀后才能饮用。原来是中午下工后大家排队拿热水瓶来打开水，后来我让大家出工前热水瓶全放在自己炕头，他们出工时我给大伙一一灌好。



夏天多个活儿，要给地里干活的知青送水，距离远近看去几号地，一般是十几里到二十里左右，一个人挑上开水沿着北大荒的土路，二十里一气下来，不停步只换肩。知青们就盼着我的身影从起伏丘陵的天际边出现，每当那一瞬我心里都特满足。难忘那次到地头，我得意地一个骑马蹲裆式将两桶放地上，就被上海女生围上了，其中不乏我暗恋的女神。

每天下午我要砍柴，水房每两天烧一车树枝，当地叫条子。都是十几米长、碗口粗的白杨与柞木树条，我将树杆全部砍成一米半左右长，树梢做引火用。我那把长柄大斧磨得锋利无比，砍树要用巧劲与臂力，将大斧头的重量从最高点用腰拽着臂膀与长柄往下悠，在斧头撞击树身那一瞬间，将全部力道集中爆发在那锋刃之上，树条子在与金属碰撞瞬间木屑飞溅，那寸劲那快感只可心领、不可言传。担水，劈柴都很累，但也乐在其中。

每晚要烧两大锅热水给大家下工回来用，我们队知青百分之九十每晚下收工后必擦澡，一盆热水全身搞定。傍晚下工，大队人马在水房门口排大队，次序井然，我蹲大锅台上手拿个大水杓往盆里分热水。下工晚的无论几点也会找我：“复强打热水。”我会留着热水给没下工的人。车把式北京知青老侠永远是最后一个，他收车喂完牲口回宿舍时大伙早吃完洗完，我一准有热水留给他。

水房的活就这些，担水、劈柴、烧火、分水，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春夏秋冬风雨无阻，记得一次秋天大雨全队不出工，我独自在滂沱大雨中挑水，每步靴子要拧一下才能抬脚，不然鞋就粘在泥里了，大雨如注中的我就像慢镜头下挑着扁担扭秧歌，眼都睁不开，心中想着杰克伦敦的雪虎，想着暴风雨的海燕，想着要有野人的体魄与现代人的头脑，那是真实的记忆，至今鲜活。

欲功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的扁担，斧子是需我精心照顾的。扁担都是我自制，从选树材，开料，打磨，钻眼都是自己亲手干，我的扁担弹性，韧劲，宽窄薄厚都有讲究。为省时间后来我一次挑四桶水，前后都是我发明的双钩挂双桶，当时只有我有这本事。长柄斧每天要磨，钢刃要淬火，要磨的锋利无比，碗口粗的树，我一般五六斧子下去肯定斩断，先斜一斧再竖一斧，啪的一声两寸厚四寸长的一块三角就崩出去，再裂口两角再各砍

一斧，搭在垫砧上抡斧往缺口最窄处再狠削两下，碗口粗的条子就断了。一车条子我两个半小时可搞定。若论担水、劈树，我在队里算是顶尖高手。

读书是北京知青精英的共性，无论活多累生活多苦但书是非看不可的，坚持每天三四个小时阅读，四年如一日。我每次探亲都带够啃一年的书回乡下，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政治经济学，中国文学史，哲学，美学，马列原著等。自己并定了周、月、年学习计划及阶段性讨论题目，主题大多与所能看的书相关。记得有历史上集权与民主政权的形成与自然环境关系，又如中华文明是什么原因没孕化出现代科学文明，等。

上海老马与我共同阅读、讨论，我们常在傍晚在分场南岗崖上，坐在崖上能望出几十里远，辽阔草甸的远处是这一带的最高峰馒头山。

我们除读书，笔记，讨论外，每周两次跑步都是晚上，以免别人奇怪这两疯子，累一天了还不够，还他妈的跑步！你见过农民干活后再跑步的吗？可我们跑，一方面是为让老马走出双脚冻残的心理阴影，另一方面我们是知青不是老乡。老马一开始只跑几百米，后来我们能跑十公里。在冰天雪地大漠荒原，我们劳作后仍在跑步，阅读，笔记，思辨。因为在我内心对生命看法并未消磨，我一直在为自己的将来进行储备。我挂在炕头一个字条上写着杰克伦敦一句话：在命运的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

2015-10-25

【述 往】

## 镇反纪实：我的劳改三十年（四）

—— 苏北农场（一）

王丕忠

### 棉田垦殖

到了滨海县，我们住进了当地的一所中学。那时正值暑假，教室可供我们住宿。课桌作床铺，凳子当饭桌，十分方便，我自被捕以来在此算住得最宽敞舒服了。可是这里并不是最终目的地，只是临时歇脚点。

最终的目的地是在县城东北十多公里的“新南公司”。所谓“新南公司”，实际上是一片荒芜了的棉田。民国初年江苏南通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在他家乡南通设了纺织厂，在苏北沿海地区买下了大片土地，种植棉花，供他的纺织厂作原料。其一名为“新南公司”，另一名为“新通公司”，合起来便是“新南通”之意，两处相距不远。后来当地发生了多次海啸，棉田屡被海水淹没，遂报废变成荒滩。调劳改犯来此是为了建设大规模的农场，并非农场已经存在。干部所谓从事农业生产，此时还不着边际。

我们到达当地时，由于住的工棚还未盖好，在学校住下等待。在闲谈中谈到调来途中所发生的事情，大家对那莫名其妙的枪声产生种种猜测。其中比较合理的说法是由于老弱病残的犯人掉队太远，押送的武装人员无法处理，便开枪打死，免去累赘。又有说法是有人逃跑，武装人员开枪打逃犯。打死一个劳改犯犹如打死一条狗，毫不足怪。

在滨海中学住了一个多星期，其间我得了疟疾，得不到医疗，干部置之不理，我只有硬挺。好在没有劳动任务，每天可以躺在铺位上休息。过了几天，到了工棚盖好通知出发的那天，我已略感好一些，可以勉强走动。出发时有两名好心的劳改犯主动替我带了一些

东西，剩下的就很轻了。从滨海中学到农场约十多公里，两地之间有一条公路相通，但因多次被淹，路面已坎坷不平。天热，途中休息了两次，一路虽不算艰苦，然而对我这患病者来说是拼命坚持才到目的地，累得动弹不得。

那地方是一块约二百公尺见方的平地，四周是约四十公尺宽的河，形成一个四方形的岛，有一木板桥与公路相通，桥旁和河的沿岸有几个岗亭，由武装人员把守。劳改犯住的是用圆木做架、用芦苇做顶的A字工棚，地上铺了木板作铺位。每人只摊到三十多公分，拥挤的程度与皖北治淮时不相上下，这是使我大为失望和最感烦恼的事。此外还有一件事也是极其糟糕，当地因受海水淹没多次，所有的河水、井水和地下水都是咸水，没有淡水。时值盛夏，经常口渴，需要喝水，可是那水又咸又苦，越喝越渴，越渴越想喝，形成恶性循环。衣服洗后穿在身上发潮发腻又发痒，这情况不是一时之苦，而是天天如此。据说伙房给我们煮的菜汤不需放盐，咸味已很浓。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的健康大受影响，病号一天天增多，我自感日益消瘦，精神萎顿，连走路都乏力。

到达农场的初期只是增建工棚，清理环境卫生。随后的任务是割芦苇，先从附近割起，逐渐向远处扩张。那地区除劳改犯的驻地是干地外，其它都是芦苇塘，看不到任何东西。芦苇长的又高又粗又密。割下芦苇是为了盖更多的工棚，调更多的劳改犯来建设农场。在开河排水之后，割掉了芦苇的土地即可用拖拉机开垦，辟为棉田。

割芦苇时实行流水作业，一个小组每天包干一块地。一部分人割，一部分人捆，一部分人把捆好的芦苇竖起来堆成金字塔形状的垛。芦苇塘水深不等，深的可没膝，浅的没踝，但从无露出地面的地方。我们整天在水里淌，一天劳动达十小时以上。午饭是送来吃的，连坐的地方也没有，只有站着吃。夏季天亮得早，黑得晚，队部是决不让劳改犯在光天化日下不干活的。

这样过了近三个月，范围越割越大，工地越来越远，而天气越来越凉。大约在十二月初，割到一个地段，非但离得远，而且上下工要趟过一片大洼塘，水深及腰。清早天气很冷，淌水又走不快，冻得人发抖。日子一长，不少人病倒，我因耐寒力较强，还能支撑。

不久以后，有一日天气突变，北风怒号，大雪纷飞，水面结起一层薄冰，当天不能出工。晚间队部通知我去领邮包，我听说有邮包寄给我，说明在这茫茫的人间苦海中还有亲人在关心我，心中十分高兴和激动。我上队部取了包裹走向工棚，地上积雪已很深，地上很滑，当时我感觉两腿酸痛发硬，走不成步，便栽倒在地上，爬不起来。包裹也摔开，东西散了一地，幸亏有一劳改犯走过，把我扶起，并帮我把东西拾了起来，还把我扶回工棚。

包裹是我父亲寄来的，那时他还未被扣押。包裹内有夹被一条和一些旧衣服，没有一样是新东西，可见家中困难，早已无钱为我买新用品了。包裹内附有一封信，是我父亲写的，告诉我母亲在某月某日夜里就寝后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去世前曾理出了一些东西嘱他寄给我，并叫我好好学习，努力劳动，争取减刑，早日回家，以慰母亲于地下。父亲信中又嘱我不要过于悲痛，以免影响健康等。我读了这封信后虽未痛哭，却忍不住凄然泪下。

不幸之事接踵而至，肉体上既受折磨，精神又受此打击，使我几乎对前途失去信心。第二天早晨两腿酸软，竟站不起来，两臂也酸软无力，手指僵硬，吃饭时连筷子也拿不成。经犯人医生来看，说是由于长时间浸在冷水中，受了寒气，一遇天气突变便成瘫痪。那时像我一样生这病的人有好几个，起因也相同，头几天出去大小便要别人搀扶。我独立性较强，极不愿依赖别人，可是现在又非依赖别人，求别人帮忙不可，心中实在烦恼，非常悲观。幸亏过了几天，天气放晴转暖。我的腿渐渐能够活动，手臂也有了一些力，双手也能握紧，也能扶着墙或东西独自走路了。

这时队部下达通知，割芦苇的任务暂时告一段落，立即转入开河挖沟的排水任务，把历年来淹没该地区的海水排到海里去，然后把土地开垦为棉田。劳改犯中除老弱病残者外一律投入，并移居到陈家港沿海地带。我因瘫痪未愈，准予留在原地从事轻度劳动，即积肥，供春播施肥之用。

在开河挖沟排水的队伍准备出发的前夕，天气又突变，刮起强劲的西北风，气温急剧下降。

夜里大家刚睡下不久，队部忽然来紧急通知，说是刚从福建调来的一个劳改大队到大

游社仓库去运粮食，归途中遇特大寒流，被风雪所阻，命令我大队除病号外全体出动去营救。只过十多分钟，队长和指导员们便在外面大声敦促集合出发，大家在一片混乱中匆匆地出发了。我从关不严的门缝中见到外面风雪交加，一群人影提着几盏马灯踉跄地越走越远，消失在黑暗中。工棚中只剩下几个病号，我是其中之一。工棚透风，又因人少，寒气凛冽，冷不可挡。我虽幸免去狂风酷寒中救人，但已不能入睡。

也不知过了多久，去营救的人陆续返回，有少数落后者一直到破晓还未回来。我问睡在旁边的人营救什么人，救了多少人？他说：

“不清楚，反正冻死了不少。”

他又说：“福建调来的劳改犯都没有棉衣，运粮归途中遇寒流耐不住冷，便躲在避风处休息，那知一歇下来便站不起来，时间一久便冻死。”

我再问一些其它的事，他不愿多说，我也不便追问。后来才知道干部曾关照他们不许对人讲这次冻死人的事，他们当然不敢多谈。

这出惨剧发生后，队部对此闭口不谈，好像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就在第二天，开河排水的队伍出发了。留下搞积肥的不足十人，我属其中之一。除少数病号外，其他都是年龄很大的。就我所能记起的有法律学家盛某，曾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和某大学法学院院长；国民党某大学校长汤某；电机学博士楼某；这三人都是留美的博士。还有国民党政府新闻署副署长，已忘了他的姓名；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邢某等人。他们学术水平较高，知识面广，我和他们相处，增长了自己的见闻，获益非浅。

我们这些人被编为一个积肥小组。所谓积肥是把枯草烂叶、死禽死兽、人便马粪以及其它一切粪尿和脏东西收集成堆，浇上污水，外面糊上烂泥，让它腐烂发酵。我在小组中被分派担任拾大便的工作，这工作虽较脏但较自由，挑着担子拿着铁铲在各处走动。积肥的范围除住处外还延伸到附近四周，因此我的活动范围很广，劳动时间很容易过。这段时期可说是我在劳改生活中的黄金时代。因为相处的人比较好，彼此谈得来，很和谐。劳动不重，当时粮食还未定量，还可以吃得饱。令人寒心的恐怖事件还未发生，精神上较安定。

可是好景不长，过了几十天，进入夏季，蚊子越来越多，沼泽地带蚊子滋生得早，而且特别大，勇猛袭人，挥之不去，夜里被叮得不能入睡。这对劳改犯又是一大威胁，大家想方设法来驱蚊。收集枯枝落叶来熏，工棚内被熏得烟雾腾腾，使人发呛和流泪，睁不开眼。工棚内因无窗户气温本来就很高，一经烧枝叶温度更高。蚊咬烟呛再加高温，这种苦况实难忍受。听说某中队一个劳改犯，不知因为犯了什么错误，被赤膊捆绑关入小号内，整夜被蚊子叮。天明后此人已失去知觉，奄奄一息，据说后来就死了。

开河的任务在秋季完成了，参加的劳改犯回到了原地。平静多日的农场，顿时又骚乱起来。我们这个积肥小组，本属临时组织，于是被解散，成员回到原来中队的小组。其中只有一个与我仍在一个中队，还能常见面交谈，其他几个人非但编散，而且不久调走了。在劳改队一经编散，便永无重见或互通音讯的可能。仍与我编在同一中队的那人姓孙，也是个大学生。我和他因相处较久，有了一些友谊。这在劳改队中是极少的现象，也是政策中所不允许的，称之为私人拉拢，视之为团帮结伙的起因，为非作歹的根源。有一天在工地上我没有见到孙某出工，以为他病了。收工后回到工棚，才知那天从南方来了武装干部来引渡孙某，是被反铐着走的，据说可能是他罪行未清，有人上告，发现了余罪。总之情况是不妙的，否则不会用武装人员来引渡，也不至于反铐。从此以后，此人的消息便杳如黄鹤，他的结局不得而知。失去一个难友，我心中不免悲伤。

### 因言起祸

有一天队部召集劳改犯开大会听报告，宣布开河排水任务胜利完成后，苏北农场正式成立，并立即转入农业生产，以种植棉花为主，兼植粮食作物和蔬菜。命令大家作好准备工作，把已着手的各项任务赶紧结尾，尽快迁到苏北农场第一支队，开始工作。这一下大家比较平静的心情又突然紧张起来。

第三天一大早，大家匆匆吃完早饭便打点行李，准备出发。第一支队离原驻地不远，只有

十多公里，但没有像样的路，再加沟渠纵横，非常难走。大家带着行李更为吃力，费了好大劲才到达目的地。所谓支队即几个大队集中在一起，大约有五千人左右。此地是第一支队，又称一分场。另外还有第二支队，又称二分场。一分场即以前提过的新南公司，二分场即新通公司，这二个分场合起来即苏北农场。

一分场原来是一片芦塘，割掉了芦苇排干了水，成为一片荒地。已有劳改犯先来此盖起了许多A字工棚，并开辟了菜园，建起了猪圈和伙房。我们到达的第二天一早便通知出工，工作是人工拉犁翻地。那时地表的芦苇虽已割去，可是地下的芦根盘根错节，坚不可拔。一个小组十二人拉一架犁，定额每天要翻二亩，事实上一半也难以完成。而且大家的鞋整天在布满芦苇茬子的地上踩，几天下来破烂不堪，工效因此更低。监工的队长和指导员看看二亩定额确实不能完成，便降低为一亩，这是极限，不能再低。上午要完成五分，不完成不开饭；下午要完成五分，不完成不收工。就这样我们便在这一亩的定额下拼命挣扎来完成。按规定每天下午五时收工，可是不完成定额不能收工，于是经常要干到六时以后甚至七时以后才能收工。回去途中天色已昏暗，连路都看不清了。

那时各大队都不能完成定额。场部，亦称指挥部，便召开分场全体大会。目的是督促劳改犯加紧劳动，要从劳动中表现出认罪服法，要从劳动中争取立功赎罪，今后政府要按各人的表现，分别给予奖惩。那讲话的干部据说是分场场长。他最后说：

“共产党最讲认真，只要决心办一件事没有办不到的。共产党为达到目的，不惜牺牲一切。”

我听了很反感，回工棚后发牢骚说：

“为达到目的不惜牺牲一切，要是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那倒罢了，只怕是不惜牺牲别人的一切。”

说了之后自觉失言，很害怕，恐怕有人去汇报。

果不出所料，第二天晚间队部通知我去。我心知不妙，出事了，只有硬着头皮去顶。来到队部，一进门只见室内只有指导员一人在。



“你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他冷冷地问。

“不知道。”

“你昨晚说了些什么？”他又问。

我想了一想，虽已知指的是什么，但装作不知，以观动静。

“我没有说什么。”我说，“想不起说了些什么。”

“你没有说什么？”他说，“就是昨晚的事，你自己说了些什么就会忘了？有人检举你，我念给你听听：某某某昨晚饭后，在工棚内当众说，共产党为了达到目的，不惜牺牲别人的一切，你说过没有？”

我听了一惊，心想事态要严重了，急忙申辩说：“我不是这样说的，把我的原话歪曲了。”于是我把原话说了一遍。

“就照你所说的原话来看，”他说，“也充分说明你对党不满，至少是对场长的报告不满。难道不是你反动思想的反映？”

我思想中存在不满是事实，不应否认，否认等于抵赖，而且与干部争辩非但无用，反会遭殃，因此我默不作声。他见我低头不语，可能认为是我认识错误的表现，便接着说：

“你先回去，两天内写一份检讨书交给我看，要写得深刻，不能敷衍了事，看你对所犯的错误能不能认识，有没有悔改的决心，再作处理，好，你回去。”

我走回工棚，别人问我是什么事，我支吾说叫我抄写东西。可是检举我的人大概心里明白，彼此心照不宣。

第二天我按一般写检讨的老一套写了一份检讨书，晚上带着它去到队部，只有指导员一人在内。我把检讨书交给他，他看完了问我：

“这就是你的认识吗？”

“是的。”我说。

“太轻描淡写了。”他说，“你的问题如果上纲上线，提高原则来分析是很严重的。你是知识分子，不比大老粗，别人对你的看法不同，问题就更严重。这次姑且认为你是一

时失言，不认为你是蓄意攻击。今后说话要特别留意，如果再犯类似错误，那就是明知故犯，新账老账一并算，一定要受到严厉处分。”

我应了一声，走出队部，心中一宽，本以为问题没有那样容易解决，想不到指导员并没有深究。事后我琢磨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本人比较开明，通情达理，不是一个极左路线的人；二是对我有一些好印象，因为我曾多次帮他抄写文件和制报表，他都表示满意。另外我两次去见他都只有他一人在队部，其他干部都不在，对处理我这问题上，他可自作主张，不受他人干扰，否则问题恐怕不会那样简单。

有些人因为一句话引起问题，提高为政治上的错误或犯罪，小会检查，大会批斗，以至关禁闭或记过加刑，而我这次都幸免。但是关于我这件事的材料和别人的检举，我的检讨书，队部批示等是否存入了我的档案，不得而知，一般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制度下，这份材料将是我终身之累。

从此以后我随时随地提高警惕，不发表自己的观点，不暴露思想，不参与有关政治问题的闲谈，别人问我有关政治和时事的问题，我推说不知道，或不作正面答复，处处避免得罪人。谨小慎微本来与我的性格和意愿格格不入，我要么无意识地不采用，要么有意识地不屑为，现在被处境所迫不得已也采用了。

场部的大会开过以后，大队开会，中队开会，最后小组讨论。每人必须发言表态，写决心书、保证书以及挑应战书，重重叠叠，不厌其烦。总之是督促每个犯人挖潜力，全力以赴来完成任务。事实上每个犯人已是形容枯槁，面无人色，哪里还有潜力可挖。■

【资 料】

##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 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1967. 11. 02)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族革命人民，满怀胜利的喜悦，向您报告一个激动人心的喜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势下，在您的“斗私，批修”伟大方针的指导下，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了！

这是您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祖国北部边疆、反修前哨阵地上的一次大捷！

这是您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创造的又一丰功伟绩！

这是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是您光辉思想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在您，我们的伟大舵手指引下，内蒙古自治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今天，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终于把内蒙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取的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了！统统夺回来了！千年青史开新篇，大地河山换新装。在您的英明领导下，内蒙古一定要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天地。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欢庆内蒙古各族人民这个盛大节日的时刻，我们心潮滔滔逐浪高，热血沸腾喜泪流，仰望着您老人家的高大形象，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最最衷心地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毛主席啊，毛主席！掀开内蒙古各族人民革命的史册，哪一页不闪烁着您伟大思想的光芒；回顾内蒙古各族人民的战斗道路，哪一程不是您步步指引。您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您是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是您，领导的伟大的人民革命，砸烂了阶级压迫的桎梏，打碎了民族压迫的枷锁，使各族劳动人民获得了翻身和解放。

是您，缔造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把昔日各族人民的牢狱变成了社会主义大家庭。

是您，制定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光辉政策，使内蒙古实现了区域自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各族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

是您，英明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指引着内蒙古各族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搭起了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天才的理论，武装着我们的思想；您伟大思想的阳光，普照着内蒙古草原。天变地变人更变，锦绣河山换新颜。从大兴安岭北麓到贺兰山脚下，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就在我们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地建设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时候，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内蒙古的代理人，要使历史的车轮倒转，要把各族人民重新推入灾难的深渊。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您洞察了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阴谋，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由无产阶级自己发动的第一次大革命。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您天才地、创造性地、划时代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有了您，世界革命前程似锦，有了您，人类前途灿烂辉煌。我们各族人民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按照您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遵照您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教导，紧跟您的伟大战略部署，高举革命造反有理的大旗，向资产阶级司令部猛冲猛杀，揪出了中国

的赫鲁晓夫在内蒙古的代理人——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罪恶阴谋，斩断了中国赫鲁晓夫伸向内蒙古的黑手。这一仗打得好，打得就是好！挖掉了埋在祖国北方的一颗大“定时炸弹”，铲除了各族人民的一个大隐患，狠狠地揍了帝修反当头一棒！

“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正当无产阶级革命派乘胜追击的关键时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恶狠狠地跳了出来，网罗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猖狂的反扑。在这严重的时刻，我们能退却吗？不能！绝对不能！历史的车轮岂能倒转！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顶阴风，战恶浪，击退了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革命尤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您老人家亲。毛主席啊，毛主席！在一场场惊涛骇浪的殊死搏斗中，在那乌云滚滚的日子里，又是您伟大的思想，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力量。我们饱含着热泪，无限深情地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起您，我们心红眼亮方向明；想起您，我们志坚胆壮骨头硬。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被围困、遭迫害的日日夜夜里，我们手捧您的红书，一次又一次地高声朗读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您的革命路线，保卫您光焰无际的伟大思想。

巍巍大青山，莽莽兴安岭，滚滚黄河水，绵绵绿草原，哪一处不激荡着革命的风暴！哪一处不翻卷着斗争的激流！哪一处没有气壮山河的战斗呼喊！哪一处没有惊心动魄的激烈搏斗！

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四月十三日，就在这一天，您老人家亲自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公布了！它像一声春雷，驱散了一时笼罩在内蒙古上空的乌云；它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前进的航程。在那最困难的日子里，您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及时、最坚决地支持我们，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力量。内蒙古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您所指引的航向，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当前形

势比任何时候都好。从工厂、商店到机关学校，从城市到农村牧区，从十几岁的娃娃到白发苍苍的老人，人人关心国家大事。人民群众从来没有发动得像今天这么广泛深入。您光辉的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入人心。人们的精神面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气风发。各族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亲密团结。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巩固强大。

毛主席啊，毛主席！这一切一切，都凝结着您老人家为内蒙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日夜操劳的心血，就是草原上最好的歌手，拉起最动听的马头琴，唱起千万支最美好的赞歌，也表达不尽我们对您老人家的无限热爱、无限崇敬的心情。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在您的光辉思想照耀下，从内蒙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回了大权，“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您老人家为我们撑腰，我们一定要为您老人家争气。我们一定用您的光辉思想掌好权，用好权，珍惜胜利，巩固胜利，发展胜利！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您最近提出的要斗私，批修的根本方针和一系列最新指示，是您对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科学、最完整、最精辟、最透彻的总结，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一千个拥护，一万个照办，誓当斗私的闯将，批修的先锋。我们永远要活学活用您老人家的伟大著作，永远以您光辉的“老三篇”为座右铭，狠斗“私”字，大立“公”字，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在“斗私，批修”中为人民立新功。我们要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集中火力，集中目标，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内蒙古的代理人，结合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斗、批、改，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您谆谆教导我们：“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对于您的这一教导，我们牢记心头，念念不忘。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现思想革命化，永葆革命的青春。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我们一定要更深入、更广泛、更持久、更热烈地开展“拥军爱民”运动，巩固祖国的统一，增强各民族的团结，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蒙修特务、日本特务，使内蒙古自治区成为祖国北部边疆坚不可摧的反修长城。让国内外的一切阶级敌人，在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坚决响应您的伟大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上加好！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庄严地向您宣誓：我们永远无限忠于您，无限忠于您的光辉思想，无限忠于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永远紧跟着您在大风大浪里奋勇前进！我们一定要用您的光辉思想来统帅一切，改造一切，推动一切。我们要把活学活用您的伟大著作看得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在一切领域里进一步树立起您的绝对权威，进一步树立起您光辉思想的绝对权威，把您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内蒙古的每一寸土地，把内蒙古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最最衷心地祝愿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各族人民的大救星，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

## 【资 料】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1967. 12. 07)

新华社天津六日电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全文如下: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天津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告一个胜利的喜讯: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诞生了!

这是您的战无不胜的光辉思想的一曲新凯歌!

这是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是您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创造的又一丰功伟绩!

阳光普照,红旗招展,渤海之滨,锣鼓喧天。在这盛大的节日里,我们欢呼,我们歌唱!您的伟大的思想哺育我们成长,您开辟的革命航道引导我们走向胜利的前方!您的恩情高过山岳,深过海洋。我们心头充满着对您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滔滔海河流不尽,曲曲颂歌唱不完。千声欢呼万声唱,最最衷心地祝愿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那掌握中国革命之舵的巨手,亲自制定了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在您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直接指挥下,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了天津,使这个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城市获得了新生,使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从黑暗走向了光明。在这永生难忘的日子里,天津的革命群众第一次放声高歌《东方红》!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在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的年代，亲临天津，视察工厂、学校、农村，对我们做了极其重要的指示。您的教导，您的关怀，您的高大庄严的形象，您的慈祥的笑容，深深地铭刻在天津革命人民的心里，鼓舞着我们沿着您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飞跃前进！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在一九六〇年，又莅临天津，和天津四百万人民一起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这是您给我们的最大鼓舞，最大光荣！激励着我们鼓足干劲，奋发图强。敬爱的毛主席啊！我们永远忠于您！海枯石烂心不变，风吹浪打志益坚。我们永远跟着您，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勇往直前！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在一九六三年，在天津受到罕见的洪水威胁的时候，亲自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动员令。您的伟大的战斗号召，表达了海河两岸千百万人民的心愿，百倍地增长了我们驯服海河、根绝水患的信念，调动了千军万马，怀着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英勇地向大自然开战！

回顾这些激动人心的情景，这些无比幸福的时刻，我们心潮汹涌，热血沸腾，千万颗红心迸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亲自发动和领导了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辟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您统帅亿万人民，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展开了猛攻。就是这个中国赫鲁晓夫，在天津解放不久，便一头扎到天津，拚命地宣扬“剥削有功”，为资本家涂脂抹粉，充当资本主义复辟的吹鼓手。此后，他又屡屡到天津放毒。臭名远扬的假四清、真复辟的“桃园经验”，就是首先在天津抛出来的。中国赫鲁晓夫还培植了万晓塘、张淮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做为他在天津的代理人。他们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妄图把天津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据点。

敬爱的毛主席，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您的战斗号令，怀着誓死保卫您，保卫您的革命路线的决心，凝集起对一小撮走资派的深仇大恨，高举革命造反有理的大旗，向他们发起了冲锋，敲响了他们的丧钟。

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感到末日的来临，他们惊慌失措，暴跳如雷，妄图扑灭您所点燃的革命熊熊烈火。他们围剿革命群众，武装镇压革命小将；他们耍阴谋，放暗箭，对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反扑；他们操纵反动组织，实行反革命夺权，制造白色恐怖；他们伸出黑手，挑动事端，转移斗争大方向，抗拒您的伟大战略部署。在那乌云翻滚的日子里，无产阶级革命派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的雄文四卷，是您的伟大思想光辉，为我们指明方向，给我们无穷的力量。是您，带领我们闯过一个个急流险滩，战胜一道道惊涛骇浪，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暴中越战越强，把海河两岸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

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是以您为首的党中央，一直关怀着我们。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总是您的英明的决策，伟大的号召，为我们拨开了迷雾，鼓舞着我们披荆斩棘，在曲折复杂的斗争中，冲锋陷阵！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最相信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最最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心。我们面对着残酷的迫害，手捧您的革命宝书，日夜仰望北京城。您及时地派来了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我们并肩作战，向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发起总攻，经过剧烈的搏斗，终于摧垮了他们所盘踞的顽固堡垒，把天津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上了您所指引的航程！敬爱的毛主席啊！没有您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便没有今天的胜利，没有我们的一切。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敬爱的毛主席，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发出的最新指示，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纲领。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闻风而动，工人阶级一马当先，条条战线万马奔腾，以“斗私，批修”为纲，迅速掀起了革命大联合的高潮，大办毛泽东思想

学习班的高潮，革命大批判的高潮。革命洪流滚滚向前，形势空前大好。在以您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天津市广大革命群众日夜盼望的红色政权诞生了！

敬爱的毛主席啊！十八个月来，您领导我们经过了波澜壮阔的战斗历程，取得了最大最大最大的胜利！千胜利，万胜利，一切胜利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中，我们认识到：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只是新的战斗的起点，展望未来，前途似锦，光明灿烂。我们任重道远，永不骄傲自满。我们决心更高举起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涤荡一切剥削阶级的污泥浊水，把天津市建设成您的光辉思想的新天地！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响应您的“要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在灵魂深处开展破私立公的大革命，彻底铲除修正主义的温床，保证我们的江山千秋万代红！我们一定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在天津的代理人，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倒、批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让您的伟大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响应您的伟大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响应您的伟大号召，把“拥军爱民”运动持久地深入地进行下去。我们一定要向守卫在首都门户，为人民屡建功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虚心学习，争当拥军的模范，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要响应您的伟大号召，依靠群众，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革命新秩序，把新生的天津建设成磐石一样巩固，钢铁一样坚强！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您的光辉的思想，是力量的源泉，是智慧的海洋。大树特树您的光辉思想的绝对权威，是我们一切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夺权，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掌权和用权也必须靠毛泽东思想。我们将永远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

把天津市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让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天津市的上空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把世界引向了以您的光辉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一个学习您的伟大著作的运动正在国际上蓬勃展开，一场新的革命风暴正在席卷全球。我们以生活在世界革命的中心而感到荣耀，为战斗在您的旗帜下而无比自豪。我们不但要做国内的革命派，还要做世界革命派。我们永远不忘国际上一切受压迫的阶级弟兄，全力支援他们的革命斗争，让您的光焰无际的伟大思想，照遍全世界！

最最衷心地祝愿您，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

【资 料】

##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1968. 1. 05)

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今天，井冈扬臂举红旗，赣江奔腾来报喜。我们井冈山儿女，怀着无比的喜悦，无限的激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告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在您光辉思想的哺育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胜利诞生了。这是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

线的又一个辉煌战果！这是您的光辉思想在革命老根据地的又一个伟大胜利！这是您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创造的又一个丰功伟绩！

毛主席啊，毛主席，广阔天宇，盛不下您给我们井冈山儿女的无限恩情；四海为墨，写不尽井冈山儿女对您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在这红旗如海人如潮、凯歌曲曲震山河的盛大节日里，我们心海卷起千层浪，纵情高歌《东方红》。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啊，井冈山儿女衷心地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

敬爱的毛主席，江西是您开创的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饱含着井冈山儿女对您的无限深情，这里的一山一水都记载着您带领我们走过的胜利征程。在中国工人阶级遭受三座大山残酷压榨的日子里，是您，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一次又一次来到安源，亲自在黑暗的煤窑点燃革命的烈火，敲响了旧世界的丧钟。从此，“不周山下红旗乱”，国际壮歌冲九天，中国工人运动沿着您指引的方向胜利前进！在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关头，是您，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以擎天的巨手，扭转了革命的航向，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在井冈山上创建了第一个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根据地，缔造了中国工农红军这支举世无双的革命武装，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开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光辉道路。在宏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是您，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号召我们“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井冈山儿女牢记您的伟大教导，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在改天换地的斗争中，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旧貌换新颜，今朝更好看。红色土地上，“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四海翻腾，五洲震荡。

最敬爱的毛主席啊，又是您，高瞻远瞩，指点中国和世界未来的前程，以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井冈山儿女，遵照您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教导，紧紧跟着您，高举井冈山革命精神染红的造反大旗，向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江西的代理人方志纯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发动了全面的总攻击，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

主义的迷梦，使您亲手开辟的革命老根据地旗更红，松更翠，革命精神永远放光辉。

最敬爱的毛主席啊，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史诗。从井冈山麓到赣江两岸、波湖之滨，处处革命浩气贯长虹，处处英雄壮歌冲霄汉。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胜利都是您光辉思想的凯歌，每前进一步都是您亲手指引！是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给我们以巨大的力量。井冈山儿女跟着您，乘着“一月革命”东风，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毁了前江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复辟资本主义的顽固堡垒。是您战无不胜的思想，扫开了九天残云，鼓舞我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在尖锐剧烈的阶级斗争中，我们把您的红色宝书紧贴心窝，仰首凝望北京城，一遍又一遍地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井冈山儿女站在您庄严而慈祥的像前，立下豪壮的誓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保卫毛主席，死了也甘心！”我们战恶浪，顶狂风，为捍卫您的革命路线而奋战，击退了阶级敌人一次又一次猖狂的进攻！敬爱的毛主席，又是您，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给我们派来了英雄的人民解放军。“赣水那边红一角”，山笑水笑迎亲人，紧握双手热泪流，红心相连情谊深。亲人与我擎红旗，井冈儿女胆更壮，腰更硬！“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亲人解放军就是这样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支左爱民”凯歌，在伟大的长城上又升起了一面光辉夺目的红旗！

敬爱的毛主席，河深海深，不如您老人家的恩情深。您时时刻刻都为我们井冈山儿女撑腰、操心。在我们仰首望北斗，迎接胜利的时刻，又是您亲自指引我们奋勇前进，使江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崭新的阶段。一轮红日照大地，万道金光映山川。九月的一个早晨，万顷稻海涌起欢腾的浪花，波阳湖水纵情高唱，每一个人的心坎都激荡着幸福的暖流。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我们取得胜利需要继续前进的时刻，您走遍全国，亲临江西。您语重心长的教导，对我们井冈山儿女是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教育，最大的鞭策！现在，在江西，您的革命路线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深入人心，您的思想从来没有象

今天这样深深扎根，人的精神面貌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焕发，无产阶级专政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巩固，工农业生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热气腾腾。回顾战斗历程，我们每一个胜利都是您伟大思想哺育的结晶。毛主席啊，毛主席，跟着您就是幸福，跟着您就是胜利。展望未来，我们豪情满怀举红旗，乘风破浪向前进！敬爱的毛主席啊，我们井冈山儿女向您庄严宣誓：我们一定继承、发扬和光大井冈山革命传统，永远忠于您，寸步不离跟着您，海枯石烂志不移。

敬爱的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从延安到北京，我们井冈山儿女深深认识了一个伟大真理：“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这是一切工作的核心。我们掌权以后，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更大规模地掀起活学活用您的伟大著作的群众运动，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建立革命的好学风。我们坚决把最大的努力用在学习毛泽东思想上，把最大的忠诚用在贯彻毛泽东思想上，把最大的热情用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上，把最大的勇敢用在捍卫毛泽东思想上。我们一定把您的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高的，让江西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人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天红地红人更红，江山万代红彤彤。我们要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让毛泽东思想普照全球，光耀万代！

敬爱的毛主席，您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科学、最透彻、最精辟的总结，是引导我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指路明灯。我们井冈山儿女，一定坚决地不折不扣地全面地贯彻和落实您的最新指示，字字照办，句句照办，永远照办！敬爱的毛主席，“要斗私，批修”是您制定的伟大战略方针和根本纲领。我们井冈山儿女一定以您的思想为武器，象“支左爱民模范排”和“支左爱民模范”李文忠同志那样，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向“私”字展开进攻战，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彻底改造世界观，以您的思想统帅一切，誓做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井冈山儿女，正紧紧跟着您，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我们一定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和斗、批、改运动，坚决、彻底、干

净地荡涤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江西的代理人所散布的一切流毒，荡涤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我们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猛促工作，猛促战备，为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而奋斗！敬爱的毛主席，井冈山儿女和人民解放军血肉相连，情谊深长。我们决心更高地举起拥军大旗，更加相信和依靠解放军，拥护和热爱解放军，学习和帮助解放军，誓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结成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江山的钢铁长城。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我们井冈山儿女一定牢记您的英明教导，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一定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新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誓死捍卫以您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让社会主义铁打江山，永存千秋，永红万代！北京升起红太阳，五洲四海都照亮。

毛主席啊，毛主席，世界已进入了以您的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您开辟的井冈山革命道路通天下，您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正为全世界革命人民所掌握。黄洋界的炮声正在亚、非、拉震荡，武装革命斗争的烈火燃遍五大洲、四大洋。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站在井冈望全球，誓做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您的率领下，我们征腐恶，缚鲲鹏，扫尽人间害人虫。让您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天下，红透全球！我们以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衷心祝愿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



【资 料】

##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 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1968年1月26日)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永远忠于您的甘肃无产阶级革命派，怀着无限兴奋无限喜悦的心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告我们战斗的喜讯：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在您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迎着东方光辉灿烂的朝阳，胜利地诞生了！光荣地诞生了！

这是西北高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次大捷！

这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又一丰硕成果！

这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创建的又一丰功伟绩！

我们欢呼，我们歌唱，欢呼您光辉思想的伟大胜利，歌唱您革命路线的胜利凯歌！

毛主席啊，毛主席！今天，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格外想念您！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千言万语，说不尽我们对您老人家的无限热爱；千歌万曲，唱不完我们对您老人家的无限敬仰。千言万语，千歌万曲，凝结成一句最美好的祝愿：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毛主席啊，毛主席！今天，甘肃的山河格外壮丽！看今朝，革命风雷激；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这大喜大庆的日子里，我们怎能忘记您带领我们跨过的万水千山，怎能忘记那波澜壮阔的战斗历程！

岷山的千里雪原啊，嵌印着您深深的长征足迹！

天险腊子口的深谷啊，回响着您那动人心弦的进军令！

哈达铺的灯光啊，如今依然照耀着甘肃人民的心田！

红军会师的凯歌啊，如今依然在会宁城下荡漾！

您那光辉的思想，照亮了甘肃的天地山河，您那伟大的形象，永远留在甘肃人民的心坎上！

三十三年前，您率领着红军举行了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今天啊，您又带领着我们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是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吹响了我們向汪鋒一小撮猛烈进攻的战斗号角！

是您，亲自发动的“一月革命”风暴，鼓舞着我们砸烂了汪家黑店！

是您，解决甘肃问题的最高指示，照亮了甘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锦绣前程！

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在最困难的时候，给我们拨开了层层迷雾；是您，在最严重的关头，给我们顶住了阵阵妖风；是您，披荆斩棘，给我们开辟道路；是您，力挽狂澜，给我们拨正船头。

多少次出生入死的考验，多少回艰苦曲折的斗争，多少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多少个光辉灿烂的黎明，我们日夜想念您啊，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想起您，心红眼亮意志坚；想起您，志高胆大方向明；想起您，千难万险无惧色；想起您，“乱云飞渡仍从容”！

北京城里报喜讯，中南海内传佳音。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您老人家解决甘肃问题的最高指示传来了！皋兰山下，红旗卷起千重浪；黄河两岸，歌声汇成万顷波。我们欢呼，我们跳跃，我们心潮澎湃，我们热血沸腾。毛主席啊，毛主席！这是您对我们甘肃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族人民的最大支持，最大鼓舞，最大信任，最大鞭策！这是您对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工作的最大肯定！您的最高指示，表达了您对甘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无限关心！

毛主席啊，毛主席！翻开甘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史册，那一章不闪耀着您光辉思想的万丈光芒，那一篇不谱写着您革命路线的胜利赞歌，那一页不渗透着您为甘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操劳的心血，那一字不包含着您对甘肃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无限关切！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是我们行动的最高纲领，您关于甘肃问题的最高

指示是我们前进的指路明灯！我们对您老人家无限无限的忠诚，对您的伟大战略部署一步不离地紧跟。我们狠斗了汪锋一小撮，我们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我们以战斗的姿态度过了甘肃文化大革命的峥嵘岁月，我们以激动的心情盼望着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祁连山在欢笑，白龙江在沸腾，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我们要高举更高举；您指引的革命道路，我们要坚决走到底。甘肃的革命历史将由我们来谱写，甘肃省社会主义大厦我们双手建！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光辉的思想，是我们前进的灯塔；您光辉的思想，是我们战斗的武器。我们一定要一辈子读您的书，一辈子听您的话，一辈子照您的指示办事。把您的光辉思想刻印在脑海里，落实在行动上。我们要让甘肃的天，成为毛泽东思想光辉灿烂的天；让甘肃的地，成为毛泽东思想阳光普照的地；让甘肃的人，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我们要让您光辉思想的旗帜，千秋万代，永远飘扬在甘肃的上空！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甘肃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刻苦地学习“老五篇”和您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誓作斗私的闯将，批修的先锋。我们要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我们要夺“私”字的权，专“私”字的政，挖掉头脑里“私”字的根基，筑起“公”字的长城。我们要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批得比当年的托洛茨基还臭，我们要把中国赫鲁晓夫在甘肃省的代理人汪锋一小撮斗倒、斗臭。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拥军爱民”的大旗。我们和解放军肩并肩，解放军和我们心连心；我们和解放军是亲骨肉，解放军是我们贴心人；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要紧跟您的伟大战略部署闹革命。我们要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我们要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我们要整顿好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我们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猛促工作、猛促战备。我们有决心、有毅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要遵循您的伟大教导，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

级专政，誓死保卫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新诞生的革命委员会。

毛主席啊，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忠于您！蘸尽东海万顷水，写满蓝天千里云，写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热爱，无限崇拜！表达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信仰，无限忠心！我们生为捍卫您而战斗，死为捍卫您而献身。为捍卫您，鲜血染红革命旗，生命献给毛主席！为捍卫您，我们刀山敢上；为捍卫您，我们火海敢闯。海枯石烂，我们忠于您光辉思想的红心永不变，地动山摇，我们高举您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不动摇！

毛主席啊，毛主席！仰望您慈祥的面孔，高举您红彤彤的宝书，抚摸那光荣的战旗，回顾那漫长的战斗里程，千万颗红心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啊，我们衷心祝愿您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 【作者补遗】

《广东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的升沉轨迹》一文的作者阿陀来信：因148期使用了他的第二稿，未使用其第三稿，因此，特将其第三稿中所增加的文字补发如下：

高翔原来在军工系统被信任提拔为副局长和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事业如日中天之时，77年因为揭批查运动，被关押两年，留党察看一年。期满后，已经恢复了组织生活。84年整党，清理“三种人”，又被定为“打砸抢分子”和“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并且所在单位党组织又再一次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86年上级没有经过基层党组织就宣布高翔退党，理由是根据中发[1984]17号文件精神，应定高翔为打砸抢份子和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整党中不予登记（但高翔文字结论里面没有用“三种人”这个名词）。他被退党，被撤职，工资水平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

（本期责编：傅青竹）

## 【本刊声明】

##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